

渡海東來忽幾秋：
明清之際渡臺文士的見聞與際遇

唐立宗

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明清之際跟隨鄭成功（1624—1662）、鄭經（1642—1681）父子的渡臺文士，多來自於福建漳、泉等地，或與鄭氏家族關係甚深者。其渡臺時間大致可分4期：第一期為先於鄭成功入臺者，第二期是1661年跟隨鄭成功攻臺，第三期是1662—1664年跟隨鄭經渡臺者，第四期則是1674年鄭經西征之後來臺者。這些文士除了鄭氏父子以及監國陳永華等人在當政外，其餘多因久遭風霜、年近衰邁，普遍趨向平靜消沉。旅臺文士的消極與隱匿，部分原因是出自於與當政者的不合，使得雙方感懷、思鄉的愁緒日增不減，無形中也耗損了明鄭政權的士氣。

關鍵字：明鄭、鄭成功、鄭經、明遺民

壹、前言

明清之際文人與官員對於臺灣的認知，多起於明中後期倭亂以及海上貿易衝突事件的加劇。如陳第（1541－1617）參加明將沈有容（1557－1628）的征倭戰役，就其見聞撰寫的《東番記》提到：「東番夷人不知所自始，居澎湖外洋海島中。」¹連帶提高臺灣舊名「東番」的能見度。同時期的莆田人姚旅則聽聞：「北港番者，去海澄七日程，其地廣而人稀，饒鹿與魚。」故漳州海澄人常前往交易特產。²臺灣的北港成為商貿據點，卻引發士大夫們的危機意識，當時福建巡撫即「以其地為東洋日本門戶，常欲遣數百人屯田其間，以備守禦」。³

特別是漳泉地區的士人，較有更多的機會探聽到關於臺澎等地的消息。泉州同安縣人蔡獻臣（1562－1641）指出澎湖「今為漳、泉州民耕漁之區，而與東番臺灣為隣，其內則浯洲、則烈嶼、則嘉禾，皆同安都圖地」。⁴漳州龍溪縣人張燮（1574－1640）在成書於萬曆45年（1617）的《東西洋考》中說明：「雞籠山、淡水洋，在澎湖嶼之東北，故名北港，又名東番云，深山大澤，聚落星散，凡十五社。」⁵他在《霏雲居續集》中

* 本文構思緣起於民國94年上半年在政大歷史所修習張玉法老師所開的「近代中國知識份子」課程，承蒙課堂上師長點撥，其後遂以持續關注明鄭時期人物相關研究。在此還要感謝林偉盛學長經常幫我解惑，以及本刊兩位審查人提供寶貴的修改意見。

1 [明]陳第，《東番記》，收入[明]沈有容，《閩海贈言》，臺灣文獻叢刊第56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年），卷2，頁24。

2 [明]姚旅著，劉彥捷點校，《露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卷10〈錯篇下〉，頁246。

3 [明]姚旅著，劉彥捷點校，《露書》，卷9〈風篇中〉，頁211。關於明代臺灣北港崛起與福建官府的管理策略，可參見徐曉望，《早期臺灣海峽史研究》（福州：海風出版社，2006年5月），頁150－181。

4 [明]蔡獻臣，《清白堂稿》，冊上（金門：金門縣政府，1999年11月），卷3〈論澎湖戍兵不可撤（癸酉）〉，頁133。

5 [明]張燮，《東西洋考》（京都：中文出版社，1969年1月），卷5〈東西洋列國考·東番考·雞籠淡水〉，頁68。

稱：「東番者，在澎湖島外，去漳僅衣帶水。」並留下赤崁築城的紀錄。⁶同安縣人池顯方（1588－1652）則提到從澎湖「出島二日名雞籠，奸商勾夷潛交賣」。⁷以上大致勾勒出臺灣南北有東番、北港、雞籠、淡水等地名稱。到了南明時期，士人對臺灣的名稱、地理位置已較能理解。例如盧若騰（1598－1664）云：「澎湖之東有島，前代未通中國，今謂之東番。其地之要害處，名臺灣。」⁸東渡日本的朱舜水（1600－1682）則告訴友人：「臺灣為海中一島，近福州。」⁹不過也有不少人對臺灣印象模糊，感到遙遠乃至惡劣，不願赴臺，誠如王忠孝（1593－1666）指出臺灣的另一稱謂「東寧」是：「僻處海東，向為紅夷所據，土夷雜處，散地華人，莫肯措止矣。間有至者，多荷鋤逐什一之利，衣冠之侶未聞也。」¹⁰

隨著戰事與政局演變，王朝交替時期的東南沿海地域出現大規模的武裝與政治性移民活動，許多文士在審時度勢下來到臺灣。¹¹有鑑於明清之際來臺文士有共同的歷史際遇，也有獨特的兩岸體驗，甚者留下寶貴紀錄，因此，本文嘗試藉由這些來臺士子的詩文作品，進而爬梳土民階層對臺灣這片土地的議論，略考其在臺活動與生命經驗，希望能對鼎革之際文士的出處抉擇有進一步的理解。

-
- 6 〔明〕張燮，《霏雲居續集》，卷40〈海國澄氛記〉，引自陳小冲，〈張燮《霏雲居續集》涉臺史料鉤沈〉，《臺灣研究集刊》，91期（2006年），頁76。
- 7 〔明〕池顯方撰，廈門市圖書館校注，《晃巖集》（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9年9月），卷3〈送張將軍再任澎湖仍往東番搜賊〉，頁72。
- 8 〔明〕盧若騰著，吳島校釋，《島噫詩校釋》（臺北：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3月），〈東都行〉，頁69。關於明人對臺灣的認識，可參見周婉窈，〈山在瑤波碧浪中——總論明人的臺灣認識〉，《臺大歷史學報》，40期（2007年12月），頁93－148。
- 9 〔明〕朱舜水著，朱謙之整理，《朱舜水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9月），卷11〈問答四·答小宅生順問六十一條〉，頁410。
- 10 〔明〕王忠孝著，夏斯點校，《惠安王忠孝公全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12月），卷2〈文類·東寧上帝序〉，頁22。
- 11 孫清玲，〈鄭氏政權時期臺灣的政治移民〉，《福建師範大學學報》，4期（1999年12月），頁131－135。

貳、蠻荒印象與渡臺議論

永曆13年（1659，順治16年），鄭成功（1624 - 1662）提出渡臺重大決策。此決定肇起於先前大舉進攻南京，卻以失敗告終，不得不退回金、廈海域。加上正值明、清雙方在軍事和政治上的形勢已經發生很大變化，面對西南的永曆朝廷一蹶不振，以及鄭軍所控制的沿海島嶼已無法支持一支龐大軍隊的後勤供應，為永續抗清起見，鄭氏自然會把注意的焦點轉向臺灣。於是在1659年年底，鄭成功擬議派遣將官先往臺灣，並考慮安頓其將領官兵家眷，將之陸續遷往金門、浯嶼、烈嶼等處。至1661年正月，鄭成功在廈門召開秘密會議，進而指出臺灣的重要性：

近為紅夷占據，城中夷夥，不上千人，攻之可垂手得者。我欲平克臺灣，以為根本之地，安頓將領家眷，然後東征西討，無內顧之憂，並可生聚教訓也。¹²

即強調對荷蘭不須畏懼，可將臺灣作為抗清反攻的基地。然而參加此次會議的一些將領，對於收取臺灣乃至必須攜家挈眷之決策是面帶難色。如將領吳豪以多次到過臺灣的經驗，力言該地「港淺，大船難進」，且多瘴癘，極易水土不服。¹³

類似臺灣是蠻荒之地看法在當時是相當普遍，故時人云：「驚聞海東水土惡，征人疾疫十而九。」¹⁴前提督黃廷（1620 - 1717）曾附和吳豪的意見，表示出相當猶豫的立場，建威伯馬信（?-1662）則主張先試探再進

12 [明]楊英撰，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從征實錄》（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5年8月），頁184 - 185。

13 [清]阮旻錫著，廈門鄭成功紀念館校，《海上見聞錄定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2月），卷1，頁44。

14 [明]盧若騰著，吳島校釋，《島噫詩校釋》，〈殉衣篇（為許爾繩妻洪氏作）〉，頁121。

攻，不盡然贊成鄭成功的親征決策。¹⁵會議結束後，就連兵部侍郎張煌言（1620－1664）也致函反對鄭成功入臺，他認為：

竊謂舉大事者，先在人和；立大業者，尤在地利。……則人和、地利，審之不可不精也。即如殿下東寧之役，豈誠謂外島可以創業開基，不過欲安插文武將吏家室，使無內顧憂，庶得專意征勦。但自古未聞以輜重、眷屬置之外夷，而後經營中原者，所以識者危之！……區區臺灣，何預於赤縣神州？而暴師半載，使壯士塗肝腦於火輪、宿將碎肢體於沙磧，生既非智、死亦非忠，亦大可惜矣！矧普天之下，止思明州一塊乾淨土……。夫思明者，根柢也；臺灣者，枝葉也。無思明，是無根柢矣，能有枝葉乎？此時進退失據，噬臍何及！古人云：「寧進一寸死，毋退一尺生。」使殿下奄有臺灣，亦不免為退步；孰若早返思明，別圖所以進步哉？¹⁶

上述看法正反映明清之際部分文士對臺灣的既定印象，畢竟臺灣地處邊陲，是外夷蠻荒之地，如何能與中原相較？普遍認為即使在當時稱做思明州的廈門備戰，也勝過遠在海外的臺灣反攻無望。

張煌言甚至贈詩勸諫：「寄語避秦島上客，衣冠黃綺總堪疑！」¹⁷王忠

15 黃典權，《鄭成功史事研究》（臺南：臺南社會教育館，1971年10月），頁32。根據江日昇《臺灣外誌》（又名《臺灣外記》）記載，將領黃廷曾提出：「臺灣地方，聞甚廣闊，實未曾到，不知情形？如吳豪所陳，紅毛炮火，果有其名，況船隻又無別路可達。若必由砲臺前而進，此所謂以兵與敵也。」〔清〕江日昇撰，劉文泰等點校，《臺灣外誌》（濟南：齊魯書社，2004年5月），卷11〈何斌獻策取臺灣黃公密疏遷五省〉，頁161。雖然《臺灣外誌》為章回小說體，往往被視為稗官野史之流，但作者江日昇的父親江美鰲曾隸屬鄭氏麾下，口傳耳授加上作者的調查和搜集，所以時人稱：「是書以閩人說閩事，詳始末，廣搜輯，迥異稗官小說，信足備國史採擇焉。」近人謝國楨亦云：「未可以小說目之。」因此可酌為參考，並謹慎引證。參見謝國楨，《增訂晚明史籍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2月），頁617－618。而學者翁佳音透過中外史料考證，同樣也指出《臺灣外記》並非如章回小說無中生有，部分記載為其他漢籍所未載，卻與荷方的《巴達維亞城日誌》等文獻一致，有相當的正確性。參見翁佳音，〈17世紀後半的漳州海商與通事〉，《歷史臺灣：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刊》，6期（2013年10月），頁7－24。

16 〔明〕張煌言，《張蒼水先生全集》（寧波：寧波出版社，2002年7月），〈冰槎集·上延平王書〉，頁156－157。

17 〔明〕張煌言，《張蒼水先生全集》，〈詩外編·得故人書，至自臺灣二首〉，頁121。

孝與鄭成功堪稱知交，卻也同意張煌言的看法，認為該全力對抗清兵，「乘此時一呼而集，事半功倍」，無法理解鄭成功渡臺決定：「而僻據海東，不圖根本，真不知其解也。」他未有渡臺的打算，反倒想要追隨張煌言的脚步。¹⁸對他而言，臺灣確實太過於偏僻了。不過，鄭成功仍堅持己見、不為所動。¹⁹耗費了整整9個月的時間，雖然面臨糧食的危機，手下士兵不斷地叛逃，但最後鄭成功還是擊敗熱蘭遮城堡的荷蘭人。²⁰他回到父祖輩來過的土地，亦即「開闢荊榛逐荷夷，十年始克復先基」。²¹鄭成功不僅率軍擊退荷蘭人，也親領水陸官兵與眷口至少三萬人入臺。²²當攻克赤崁地方時，便下令改地名為「東都明京」，並發布政令：

東都明京，開國立家，可為萬世不拔基業。本藩已手闢草昧，
與爾文武各官及各鎮大小將領官兵家眷聿來胥宇，總必創建田宅等
項，以遺子孫計。但一勞永逸，當以己力經營，不准混侵土民及百
姓現耕物業。²³

可見將東都一地視作反攻的重鎮，舉家遷業之舉，更表明將臺灣視作永續經營的基地。亦即盧若騰所形容的：「於此闢天荒，標立東都名。」²⁴其後，隨著清軍攻破金、廈二島，鄭屬各鎮紛紛叛離，身為鄭成功的長子鄭經（1642–1681）亦被迫放棄大陸腹地，不得不率眾退往臺灣。至此可說鄭氏反攻事業的重心已完全在臺灣了，而大批的移民陸續抵達臺灣，也因此將

18 [明]王忠孝著，夏斯點校，《惠安王忠孝公全集》，卷8〈書翰類・與張玄著書〉，頁195。

19 據《臺灣外誌》所載，鄭成功亦曾言道：「吾若不決志東征，苟徇諸將意，株守各島，豈不笑吾英雄為其所束縛？今當馳令告處，收沿海之殘民，移我東土，開闢草萊，相助耕種，養精蓄銳，俟有釁隙，整甲而西，恢復迎駕，未為晚也。」參見〔清〕江日昇撰，劉文泰等點校，《臺灣外誌》，卷12〈入緬甸桂王受辱閱祖訓成功壽終〉，頁176。

20 鄭家軍與荷蘭人雙方艱辛的戰鬥對峙，可參見林偉盛，〈國姓爺攻臺之役的再思考〉，《臺灣文獻》，55卷4期（2004年12月），頁1–32。

21 [明]鄭成功，〈復臺〉，收入〔清〕不著編人，《延平二王遺集》，玄覽堂叢書・續集（第26冊，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85年12月），頁427。

22 [清]施琅撰，王鐸全校注，《靖海紀事》（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卷上〈盡陳所見疏〉，頁53。

23 [明]楊英，《從征實錄》，頁189。

24 [明]盧若騰著，吳島校釋，《島噫詩校釋》，〈東都行〉，頁69。

臺灣的歷史重新書寫。

參、明鄭時期渡臺的文士

來臺移民中有不少鄉紳、文士是跟隨軍伍入臺定居。鄭成功非常禮遇縉紳名士，每歲皆有優俸，並待以客禮，猶如國策顧問，當徵詢軍國大事時，皆稱「老先生」而不直呼名諱。²⁵就連鄭成功本身也是儒士，早年他在南京太學就讀，錢謙益（1582－1664）對其詩評論為：「聲調清越，不染俗氣；少年得此，誠天才也。」而瞿式耜（1590－1651）也評論「他日必為偉器，可為吾師得人慶」。²⁶所以當避難南方的縉紳得知鄭成功有東進之意，紛紛相隨，如廣東吳川人陳紹顏，他是崇禎12年（1639）舉人，「少負文名，晦跡山林間，聞鄭成功在臺灣，往從之」，可惜至福建，以未薙髮被清吏所殺。²⁷因此清儒全祖望（1705－1755）稱：「開國以來，臺灣不入版圖，及鄭氏啟疆，老成耆德之士皆以避地往歸之。」²⁸

當時渡臺的文士有多少人呢？連橫（1876－1936）在《臺灣通史》一書中曾記：「吾聞延平入臺後，士大夫之東渡者蓋八百餘人。」不過這個數字尚無確切的史料依據，更因「姓氏遺落，碩德無聞」，以致這些文士事蹟均湮沒不彰，即使多方搜訪，《臺灣通史·諸老列傳》也僅列了17位渡臺文士。²⁹值得注意的是，正由於大多數文士對臺灣的了解不夠，所以明鄭

25 〔清〕夏琳，《海紀輯要》，臺灣文獻叢刊第22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年6月），卷1，頁14。

26 〔清〕不著編人，《延平二王遺集》，頁426－427。毛一波指出收入《延平二王遺集》的鄭成功詩文，係據呂留良（1629－1683）抄本為之，留有錢、瞿兩人的註評。參見毛一波，〈鄭成功的早年事跡〉，《南明史談》（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年11月第2版），頁156。

27 謝正光、范金民編，《明遺民錄彙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7月），頁768。

28 〔清〕全祖望，〈徐都御史傳〉，收入諸家著，《徐閻公先生年譜》，臺灣文獻叢刊第123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年10月），頁69。

29 連雅堂（橫），《臺灣通史》，冊下（臺北：黎明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5年1月），卷29〈列傳一·諸老列傳〉，頁714－721。

時期的渡臺文士者，多半是來自福建或與鄭氏家族關係甚深者。為了能完整說明當時渡臺文士的際遇，本文估算渡臺文士可考來歷事跡者共有57人（依出身、文事與任官經歷之廣義認定，亦包括特使人員，參見附表），其中44人來自福建，5人來自江南，3人來自浙江，廣東、湖北、遼東各1人，他地或有待詳查者2人。尤其籍貫是福建泉州府者，高達37人，顯然地緣因素相當重要。此外，就來臺文士的出身而言，取得進士功名有9人，舉人3人，生員或貢生15人，世胄、官員子弟則有22人（包括入育胄館子弟）。可見有重要功名身份的文士者亦不在少數，因此鄭氏在臺初期的反清復明大業，也較易站穩腳跟，進而能播散或推動文教事業。

其次，來臺移民之文士者，可就其來臺時間，分為4期探討：

第一期：先於鄭成功入臺者，即在1661年（永曆15年，順治18年）以前。這個時期來臺文士絕少，一方面臺灣被荷蘭人統治，另一方面臺灣又被明鄭當作流放之地。例如鄭成功就將失職官員幽置於臺灣，為此徐孚遠（1599 - 1665）寫下：「海外之海遷人希，家人散盡獨居夷。」³⁰而沈光文（1612 - 1688）原有意舉家遷移，乘舟卜居泉州，不料途中遭到颶風飄至臺灣，可說是意外抵臺的，並非有意追隨鄭家軍。³¹沈光文晚年回首往事：「向余初至之日，每見盲風癱雨，山瘴溪烟，人則去國懷鄉，地則遷陵變

30 [明]徐孚遠撰，姚光輯，《釣璜堂存稿》，清代詩文集彙編1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據民國15年金山姚氏懷舊樓刻本影印），卷7〈七言古詩三·懷常雪嵩〉，頁437。

31 沈光文入臺時間頗有爭議，主要有1651、1652與1662年三種說法。主張1651年者多依全祖望（1705 - 1755）撰寫的沈光文傳記，認為沈氏早在1651年就意外來到臺灣，學者石萬壽還利用《沈氏族譜》指出此時沈光文是為了投奔施琅，遭颶風飄至臺灣。但潘承玉考訂1652到1661年間，沈光文一直都在金、廈一帶或暫居南澳等地，未遑他往，至1662年底，沈氏接受福建總督李率泰的招降密函而展開投誠行動，途中卻發生意外至臺灣，而全祖望對這段史實或有曲意維護之嫌；南炳文以沈氏〈東吟社序〉與諸詩認為，一個人行蹤當以本人自應所知最為正確，亦持1662年說。不過近年隨著臺灣諸羅首任知縣季麒光《蓉洲詩文稿》的出版，學界對過往考訂感到懷疑，或另外提出沈光文來臺的時間可能是1658年底。參見石萬壽，〈沈光文事蹟新探〉，《臺灣風物》，43卷2期（1993年6月），頁15 - 36；潘承玉，〈真相、遮蔽與反思——關於一樁文化史公案的後續考察〉，《紹興文理學院學報》，27卷3期（2007年9月），頁93 - 100、《南明文學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12月），頁330 - 437；南炳文，《明清史考錄》（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9月），頁261 - 263；樂承耀，〈材料、事實與反思：有關沈光文的“一樁文化史公案”——兼與潘承玉先生商榷〉，《中共寧波市委黨校學報》，34卷5期（2012年9月），頁100 - 108；張萍，〈從《蓉洲詩文稿》探究沈光文生平事蹟〉，《寧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5卷6期（2012年11月），頁51 - 55。

谷。即有一二高人，佳興不生，獨余娓娓好噏不倦。」³²正因沈光文甚早入臺，留下諸多著述，又曾致力於文教事業，故後人讚揚他為「東海文獻鼻祖」。³³

第二期：1661年隨鄭成功來臺者。有葉亨、蔡政（?-1668）、楊英（?-1680）、謝維（1618-1682）、蔡鳴雷、顧祩等，他們均為鄭氏陣營中的重要文官，如葉亨擔任承宣司，蔡政任禮都事，楊英為戶官，謝維歷職至工官。其中當屬顧祩的際遇最為特別。顧祩，字南金，在明季時曾加入復社，1645年6月當南京、杭州相繼城陷後，薙髮降清，接受清貝勒博洛（1613-1652）薦辟，擔任糧儲道參議、福建按察使僉事、分巡建南道等官職，但因故遭拘羈革職為民，遂於東南沿海各省從事秘密抗清活動。至1661年頃，顧祩附從鄭成功出海渡臺，隔年年底被鄭經任命為明鄭東都承天府府尹，任期是該官職自設置以來最久的一位。³⁴這段時期兩岸往來通暢，在金、廈兩島不斷有船隻開往臺灣，文士間亦留有送別贈言之作品。如盧若騰的〈送人之臺灣〉詩云：「臺灣萬里外，此際事紛紜。物力耕魚裕，兵威戰伐勤。水低多見日，涯遠欲無雲。指顧華夷合，歸來動聽聞。」³⁵

第三期：1662-1664年間追隨鄭經來臺者。在這段期間，鄭經先是

32 [明] 沈光文，〈題梁溪季蓉洲先生海外詩文序〉，收入〔清〕季麒光撰，李祖基點校，《蓉洲詩文稿選輯·東寧政事集》（香港：香港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頁2。

33 [清] 李聿求撰，凌毅標點，《魯之春秋》，明末清初史料選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年8月），卷11〈寺院三〉，頁118。

34 唐立宗，〈明鄭東都承天府尹顧祩生平事略考〉，《臺灣文獻》，56卷4期（2005年12月），頁1-22。除了任丞天府尹外，顧祩似乎也擔任過東寧的談判代表。據《罪惟錄》記載，1669年清鄭進行和談，鄭方的書稿為軍師陳永華所撰，稱清廷代表「今閣下銜命而來，前移諸事，未之詳及；僅諱諱迎敕為辭」，表示前事商議底定，方能繼續談判。《罪惟錄》作者查繼佐（1601-1676）指出所謂的「前移」，「係初建寧道顧□□字南涇者，曾以南寧所請割地、輸課諸件，內不答；安民為事，指此也」。由此可斷定「建寧道顧」即是擔任過清初分巡建南道、建寧副使的顧祩，稱謂正符合。而字「南涇」者，當為「南金」之音訛；惟「南寧」之意殊不可解，或為「東寧」？作者另一著作《東山國語》稱：「係初建寧道顧某（字南涇）者，曾以□□所請割地、輸課諸事，北不之答。所云『安民為事』，指此也。」缺字雖亦不可解，但總之均反映顧祩在1669年以前曾奉命與清議和，論及割地、輸課等事。參見〔清〕查繼佐撰，方福仁點校，《罪惟錄》（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卷9〈抗運列傳諸臣下·鄭成功〉，頁1571；〔清〕查繼佐撰，《東山國語》，臺灣文獻叢刊第163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年），〈臺灣後語〉，頁99-100。

35 [明] 盧若騰著，吳島校釋，《島噫詩校釋》，〈送人之臺灣〉，頁180。

於1662年10月赴臺平定內亂，以確保領導地位，翌年再返廈門處理鄭泰（?-1663）事件與迎戰清軍，但這時軍心動搖，眾將叛離，赴清投誠者甚多。³⁶彼時鄭經最倚賴的是擔任戶官洪旭（1605-1670）、諮詢參軍陳永華（1634-1680）等少數親信，有鑒於「眾叛糧乏，難以久駐」，³⁷鄭經遂於1664年3月再次率領部分將士及眷口等約有六、七千人退往臺灣，跟隨文士則是以明宗室、鄉宦為主，俱乘扁舟從行。³⁸渡臺文士有洪旭、陳永華、郭貞一、王忠孝、徐孚遠、盧若騰、紀琮、葉后詔、辜朝薦（1599-1668）、李茂春（?-1675）、吳鳳胎（1605-1680）、沈佺期（1609-1681）、許吉燝（1618-1695）等人。以上王忠孝、徐孚遠、盧若騰等文士，均留有文學作品。紀琮是同安名士紀許國（1621-1661）長子，「浪跡而東，為延平郡王客」，任承宣司知事、吏官都吏，居臺時曾書丹〈上護軍驃騎將軍蔣公墓誌銘〉，現仍存世。³⁹而鄭經亦有文學根基，他自謙：「余自幼從師，僅記章句耳，至十餘歲，方粗識大略。」他日理萬機，但喜文學、藝術，自度曲徵歌，登山臨水，不廢吟詠，還以潛苑主人為名撰《東壁樓集》，客觀反映他是好學能文的儒雅之主。⁴⁰不過，除了鄭經的親信外，旅臺文士多先行歸隱，在政治上並未有太大建樹。倒是南安縣人沈佺期渡臺以後，見臺灣葭荒，軍民不服水土，病患甚多，於是沈佺期「以

36 鄭泰是鄭成功族兄，為鄭經族伯，時任戶官，掌財政大權。1663年鄭經返回廈門，6月初即以鄭泰曾密謀擁立成功弟鄭襲為由，用計設局誘殺之，諸部大驚，於是數月之間鄭鳴駿、陳輝等陸續率眾投清，估計降清者約有文、武屬官四百餘員、船一百八十餘號、兵七千三百餘名。據日人浦廉一研究，此事件爆發的癥結點，應該是鄭泰將公帑私存於日本長崎，卻未啟明與收回存銀之意。參見浦廉一著，賴永祥譯，〈延平王戶官鄭泰長崎存銀之研究〉，《臺灣風物》，11卷3期（1961年3月），頁25-150；張葵，〈鄭經鄭克塽紀事〉，臺灣研究叢刊，第86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1966年6月），頁16-21。

37 [清]夏琳，〈海紀輯要〉，卷2，頁35。

38 孫清玲，〈鄭氏政權時期臺灣的政治移民〉，頁133。

39 參見〈紀石青夫妻合葬墓誌銘〉、〈紀母葉太君墓誌銘〉，均收入何炳仲、吳鶴立編纂，《廈門墓誌銘匯粹》（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1年6月），頁156-157、159-161。以及黃典權，《蔣鳳墓誌銘研究》（臺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68年）。

40 [明]潛苑主人（鄭經），《東壁樓集》（臺北：高橋情報，1990年據日本內閣文庫收明甲寅[1674]年序刊本影印），〈自序〉，頁1a；朱鴻林，〈鄭經的詩集和詩歌〉，《明史研究》，第4輯（合肥：黃山書社，1994年），頁212-230；龔顯宗，〈從《東壁樓集》看鄭經與臺灣〉，《歷史月刊》，173期（2002年6月），頁49-54。

醫術濟臺人，凡富家貴族相延，輒往；即貧窶者亦不自貴重」，行醫二十餘年，貢獻卓著。⁴¹這段時期較為特殊的是清廷曾派數名特使赴臺協商和談，如在1669年，興化知府慕天顏（1624－1696）特加太常寺卿銜領員渡海談判，該段經歷讓他熟知沿海險要，所以後來慕天顏提到「奉使臺灣之日，臣身經島嶼，目覩情形」，建議在沿海設重兵扼守。⁴²

第四期：1674年三藩之亂，鄭經西征而兩岸復通、因故避難來臺者。此時初至臺者在政治上沒有影響力，在臺相關行蹤亦難以捉摸。如祝髮為僧的林英，間道至廈門，嗣入臺灣。⁴³惠安人張士樞（1583－1682），明亡即入山，數年不出，因耿精忠（？－1682）之變避亂金門，遯跡臺灣，隱居於東安坊，杜門不出，以書史自娛，辟穀三年，惟食茶果。⁴⁴同安人張灝（1587－1683）、張瀛（1598－1681）兄弟在隆武政權時期（1645－1646）分別任職方郎中、兵部司務官，後隱於大嶝，1680年始渡臺灣。⁴⁵晉江人諸葛倬（1605－1683）在隆武時期擔任過監軍等職，加入鄭成功陣營時進光祿寺卿銜，後滯留於金廈等地而歸農隱居。友人降清為新貴，曾書信提及若「幡然肯來，監司可立致，且怵以危語」，但諸葛倬斷然拒絕，不予理會，即攜眷與子諸葛晃、璐入臺，聞臺灣將內附時，鬱鬱發疾，卒年七十九。⁴⁶因此，隨父來臺的諸葛晃曾撰文，表示自己歲辛酉年（1681）

41 〔清〕蔣毓英撰，《臺灣府誌》，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71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影印，1997年），卷9〈人物·縉紳流寓·沈佺期列傳〉，頁382。

42 〔清〕慕天顏，《慕中丞疏稿·輯瑞陳言》（清康熙25年刻本，上海圖書館藏），卷1〈謹奏為閩防之戰守兼資古法之策遊堪採冒陳愚見仰乞聖裁事〉，頁37b。

43 謝正光、范金民編，《明遺民錄彙輯》，頁400。

44 謝正光、范金民編，《明遺民錄彙輯》，頁637。

45 謝正光、范金民編，《明遺民錄彙輯》，頁636。

46 參見謝正光、范金民編，《明遺民錄彙輯》，頁1100；〔清〕溫睿臨撰，《南疆逸史》，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33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北京圖書館藏清傅氏長恩閣抄本影印，1997年），卷18〈列傳第十四〉，頁272－273。另據《鄭氏關係文書》收入的明鄭文武官員冊底，可以發現諸葛倬在康熙初年是以「偽隆武兵部車駕司主事，投誠歸農」。又據密報，另一子諸葛鼎曾隨其父「諸葛倬入海，舌耕糊口」，投誠後已補為肇慶府同知。參見《明清臺灣檔案彙編》，第1輯第7冊（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4年3月），頁34、64。可見諸葛倬降清後即隱居，雖有一子仕清，但他本人仍堅持遺民理念，不仕二姓。直至耿精忠發動的閩變動亂，為求生存，因故攜家眷渡海。諸葛倬家族族人有歸隱、仕清乃至追隨明鄭（亦有可能被迫）等等行為，當為時勢所趨，嗣有足夠的史料，是很值得研究的對象。

已「在海東」，聽聞過臺灣本地發生的時事。⁴⁷諸葛璐就此久居臺灣，「浪跡海外」，明鄭統治結束後，亦不時往返臺閩兩地，並與陳夢雷（1650 - 1741）為忘年之交。⁴⁸另外還有部分渡臺文士是鄭經西征時擄獲的降清官紳或鄉勇眷屬，如洪承疇（1593 - 1665）姪子士昌、士恩以及明翰林楊明琅（1612 - 1675）的眷口，他們均被流放至雞籠、淡水，死於戍所。⁴⁹成為長期不為人所知的一群渡臺失意文士。

肆、臺澎生活與主要見聞

一、渡海旅居

中國大陸與臺灣僅隔著臺灣海峽，從金門、廈門等渡口出航，往昔費二、三日即可抵臺，但由於俗稱「黑水溝」的急流阻隔，欲橫渡臺灣海峽的先民，必以澎湖為關津。1661年3月22日，鄭成功集結軍兵登船，23日從金門料羅灣出發，次日「各船俱齊到澎湖，分各嶼駐札」，曾在此候風、覓食，等待出航。⁵⁰澎湖在明鄭時期又常作為水軍操演、中繼的基地，鄭經有詩云該港灣「舳艤連遠漢，旗旆蔽長江。帆影掛山路，波聲度石矼」。⁵¹明清之際來到臺灣的士子，也多半會在澎湖停留駐足。如王忠孝、辜朝薦跟隨鄭經渡臺時，在澎湖海域遭遇到大風雨，對於這次「風波震撼，浪兼天湧」

47 [清]諸葛晃，〈為孝烈傅氏女乞言〉，收入〔清〕陳國仕輯錄，《豐州集稿》，冊下（南安：南安縣志編纂委員會，1992年10月），頁462。

48 關於諸葛璐事蹟，可從《南疆逸史》中尋出些蛛絲馬跡，他除了是諸葛倬之子外，亦是陳永華女婿。諸葛倬曾為陳夢雷詩文集作序，自稱讀於「金臺旅次」。而陳夢雷亦多有詩記「諸葛元策曰」，可推知諸葛璐的表字是元策。參見〔清〕溫睿臨撰，《南疆逸史》，卷18〈列傳第十四〉，頁273；〔清〕陳夢雷，《松鶴山房詩集》，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41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銅活字印本影印，1995年），頁539，以及卷4詩文。

49 [清]阮旻錫撰，廈門鄭成功紀念館校，《海上見聞錄定本》，卷2，頁59；〔清〕夏琳，《海紀輯要》，卷2，頁45。

50 [明]楊英，《從征實錄》，頁185。

51 [明]潛苑主人（鄭經），《東壁樓集》，卷5〈五言排律·駐師澎島除夜作得江字〉，頁14b。

的體驗，王忠孝有〈同辜在公年兄抵澎湖坐漁舟風雨大作賦此志感〉一詩：

中原遭版蕩，王室嘆飄搖。孤臣慚報國，祇有勵貞標。波濤經
薦險，風雨任蕭蕭。非敢侈忠蓋，分義不容澆。逢有同心侶，罔恤
艱與夷。蘭芷芬共臭，松筠葉相依。跼蹐漏帆下，衣衫濕侵肌。呼
爐煨村酒，藉以避寒飢。開樽雨復作，徙倚靡所之。舟子形憂嘆，
家僮懷鬱伊。何以度長宵，浩吟破悶詩。矢志既如此，困厄莫須
疑。偃臥板帆眠，輾轉畏淋漓。⁵²

風雨交加帶來的波濤洶湧，以及面臨生死關頭的經歷，確實會讓文士觸景傷情，甚至感同到個人與國家存亡的共鳴。王忠孝在澎湖停留一個月，本想擇地卜居，但「借棲無地」，只得作罷。⁵³澎湖的地景異常奇特，澎湖群島除了最西端的花嶼屬於玢岩外，幾乎都是深刻嶙峋的玄武岩；每座島又因岩層結構和風浪衝擊力道差異，造成不同的節理風貌，令人嘆為觀止，盧若騰的〈澎湖文石歌〉可說譬喻出奇景的美妙。⁵⁴只可惜盧若騰抵達澎湖時，已經病重，最終葬於澎湖太武山麓，〈澎湖文石歌〉已是最後的遺作。

即使能順利渡海來到臺灣，登陸後仍要面臨坎坷艱辛的歷程。尤其是驅逐荷蘭人的征戰，死傷慘烈，正如時人詩云：「紅夷怯戰鬥，獨特火器精，城中一砲發，城下百屍橫。」⁵⁵況且臺灣西南海岸多是泥沙淤淺，登陸不易，若非熟悉地勢，否則登岸必然大費周章，譬如鄭經抵臺時，立刻指示「東都險要，惟恃安平」，命令將領趕緊研擬當從何條港路登岸。⁵⁶

文人常在休旅時吟詩唱和，沈光文居臺時間較久，抵至赤崁時〈題赤

52 [明]王忠孝著，《惠安王忠孝公全集》，卷11〈詩類·同辜在公年兄抵澎湖坐漁舟風雨大作賦此志感〉，頁246-247。

53 [明]王忠孝著，《惠安王忠孝公全集》，卷2〈文類·自狀〉，頁39。

54 [明]盧若騰著，吳島校釋，《島噫詩校釋》，〈澎湖文石歌〉，頁146。

55 [明]盧若騰著，吳島校釋，《島噫詩校釋》，〈殉衣篇（為許爾繩妻洪氏作）〉，頁121。

56 [明]鄭經，〈諭周全斌呈進兵方略〉，收入〔清〕不著編人，《延平二王遺集》，頁445。

崁城匾額圖〉詩，明確表述時事抒懷。⁵⁷其後，沈光文移居至目加溜灣社附近，〈曉發目加灣即事〉、〈發新港途中即事〉、〈移居目加灣留別〉等詩均表述出他的活動。⁵⁸不過，諸葛晃來臺定居於近海處，週遭環境與家鄉景象大異其趣，實在難以適應，他在書信中說：

所居之地，荒沙一帶，前後皆海，數椽竹屋，與營卒漁家相錯處。樹木擁腫，皆非中國之植。夏秋之交，潮一盛至，則几席之下，皆為巨浸，坡公詩所謂「小屋如漁舟，茫茫水雲裏」者。旅斯三載，不特美景良辰，歡情永絕，舉凡世間奇籍異書，名花時鳥，都無到目，勿問消受矣。⁵⁹

濱海而居、看海聽濤之日維持3年，日復一日，縱使植被景觀殊異，但生活貧乏，平淡無奇，才會讓諸葛晃有所抱怨。

當然，在臺文士亦不乏寄情山水詩作。如王忠孝〈東郊行〉：「逸興踏芳郊，春風處處同。心煩傍岸柳，身弱怯繁霜。椎結多隨漢，衣冠半是唐。好將開濟手，文治接鴻濛。」⁶⁰鄭經在閒暇經常出遊散心，也有詩遊作品，如〈和柯儀賓侍遊潛苑咏〉云：「錯落因山結，四時紅綠情。花開改岸色，鳥噪雜流聲。落日因波泛，孤舟與鷺輕。共遊歌未了，江月兩平明。」⁶¹這些詩文所描述的臺灣旅景，仍以寫意居多，就像〈題東寧勝境〉所闡述的臺灣山水之美：「定鼎寧都大海東，千山百壑遠橫空。芳林迥出青雲外，綠水流碧澗中。」⁶²即為一例。

57 其詩云：「鄭王忠勇義旗興，水陸雄師震海瀛，礮壘巍峨橫夕照，東溟夷醜寂無聲。」收入龔顯宗編著，《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資料增補》，冊上（臺南：臺南市政府文化局，2012年11月），頁49。

58 諸詩均收入龔顯宗編著，《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資料增補》，冊上，頁56、63。

59 [清]諸葛晃，〈臺灣答友人書〉，收入[清]陳國仕輯錄，《豐州集稿》，冊上，頁221。此信當是1683年頃清廷平臺時所書，該信首稱「某一自離居，七悲秋氣」，應指1677年鄭經軍潰，泉州各地動盪不安，造成諸葛晃一家流離失所。至1680年，因七府連敗，金廈兩島亦失，鄭經踉蹌中率眾退返臺灣，於是諸葛家族亦播遷來臺，在臺駐留時間即「旅斯三載」。

60 [明]王忠孝著，《惠安王忠孝公全集》，卷11〈詩類·東郊行〉，頁248。

61 [明]潛苑主人（鄭經），《東壁樓集》，卷3〈五言律·和柯儀賓侍遊潛苑咏〉，頁27a。

62 [明]潛苑主人（鄭經），《東壁樓集》，卷4〈七言律·題東寧勝境〉，頁1a。

文士知交在異域互相唱和，別有一番滋味上心頭，如同徐孚遠所云：「絕域同誰老？今來遇所知。天末亡文獻，人猶識羽儀。笑談清賞共，杯斝旅途宜。故交零落盡，微往淚雙垂。」⁶³但對明鄭晚期臺灣詩歌倡和風氣，諸葛晃卻有所批評，「此地邇來詩道殊盛，蓋干戈日尋，學校久廢，科目不設」，以致策、賦、古文、制義等「俱無所用」，「惟茲間公子才情相競」，「亦常廣宴邀題，分箋所和」。他認為此「雖強應一二，而終非所樂」，因為「韶光易逝，修名未立，雕蟲角技，諧聲斗靡，可寄興於適然，而非資心之實務也」。⁶⁴

二、墾荒事業

福建沿海戰火不絕，土地長久荒蕪，糧食生產無法供應民需。盧若騰在金門時就長嘆「嗟我村民居瘠土，生計強半在農圃」，久旱不雨時節在家鄉種田還不如栽種甘蔗，然一蔗值一文，卻常遭兵卒強奪。⁶⁵形成「故鄉無粥饅」，必須赴臺「來墾海東田」。⁶⁶

可是早年臺灣開發不易，且「土民耕種，未得其法」，遍畝禾稻，「土民逐穗採拔，不識鉤镰割穫之便」。⁶⁷針對這種景象，盧若騰的〈東都行〉、〈海東屯卒歌〉等詩，都反映明鄭時期積極推展屯墾事務與開墾之艱辛，如「官司嚴督趣，令人墾且耕」、「那知草根數尺深，揮鋤終日不得息」。⁶⁸而王忠孝的家族為了家計，早已有人先行來臺開墾，王忠孝以〈東寧風土沃美急需開濟詩勗同人〉一詩，也支持官方的開墾事業，他讚揚道：「巨手劈洪濛，光華暖海東。耕耘師后稷，絃誦尊姬公。風俗憑徐化，語音

63 [明]徐孚遠撰，姚光輯，《釣磧堂存稿》，卷11〈五言律詩四·在東贈友〉，頁502。

64 [清]諸葛晃，〈臺灣答友人書〉，收入〔清〕陳國仕輯錄，《豐州集稿》，冊上，頁221。

65 [明]盧若騰著，吳島校釋，《島噫詩校釋》，〈甘蔗謠〉，頁87。

66 [明]盧若騰著，吳島校釋，《島噫詩校釋》，〈海東屯卒歌〉，頁117。

67 [明]楊英，《從征實錄》，頁193。

68 [明]盧若騰著，吳島校釋，《島噫詩校釋》，〈東都行〉，頁69；〈海東屯卒歌〉，頁117。

鄧孔昭則指出，盧若騰對鄭成功東征持懷疑的立場，所以其部份詩句不能客觀肯定當時屯墾實情，倒是能夠做為理解鄭氏軍隊開墾的艱難。參見鄧孔昭，《鄭成功與明鄭在臺灣》（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3年4月），頁46-47。

以漸通。年來喜豐稔，開濟藉文翁。」⁶⁹加入開墾事業的文士還有徐孚遠，他表示東渡臺灣之目的在於：「明歲土膏應早發，好隨陶亮共扶犁。」⁷⁰又隨著眾人移民墾荒，村野間已出現「崎嶇石田傍流澗，屈曲山泉通溉渠」的灌溉工程，從鄭經的〈田家〉詩云：「稚童驅牛下澤陂，老婦提筐入竹籬。妻兒餉饋坐隴畔，葵蕨蔬羹黃粟糜。數瓢濁醪同歡飲，酌罷低頭復敷蓄。日落將暮山首西，牧子吹笛過前溪。農夫負耜歸家去，嘻嘻笑接兒女妻。」⁷¹可見披荊斬棘之後，農業漸興，浮現出一幅農村田園美景。

在荒旱新闢之地，無疑蕃薯是值得耕作的農作物。《東西洋考》曾紀錄：「甘藷，漳名番薯，以其種自東番攜來也。」⁷²鄭德瀟〈蕃薯序〉指出其品種繁多，「飢歲賴以全活者甚衆」，而浯島上有謂之「三姊妹藤」者，因種之多獲，「剪插之，果倍登」，故民間相競傳種。⁷³徐孚遠卜居烈嶼時也發現：「地偏少穀食，半倚薯為精」。⁷⁴盧若騰〈蕃薯謠〉稱「蕃薯種自番邦來，功均粒食亦奇哉。島人充殮兼釀酒，奴視山藥與芋魁。根蔓莖葉皆可啖，歲凶直能救天災」，不過在驕兵悍將的搜括掠奪下，使得「遍地薯空不留荄」。⁷⁵楊英在《從征實錄》紀錄了鄭軍在澎湖時，由於行糧不足，曾調集部伍在島上採集糧食，搜索2日的結果，觀察到「各嶼並無田園可種禾粟，惟蕃薯、大麥、黍稷，升斗湊解，合有百餘石」，只是仍「不足當大師一餐之用」。⁷⁶

除此之外，文士對臺灣的水果印象極深。例如釋迦，沈光文有詩云：「稱名頗似足誇人，不是中原大谷珍。端為上林栽未得，只應海島作安

69 [明]王忠孝著，《惠安王忠孝公全集》，卷11〈詩類·東寧風土沃美急需開濟詩勗同人〉，頁250。

70 [明]徐孚遠撰，姚光輯，《釣磧堂存稿》，卷15〈七言律詩四·陪飲賦懷〉，頁572。

71 [明]潛苑主人（鄭經），《東壁樓集》，卷2〈七言古·田家〉，頁7a。

72 [明]張燮，《東西洋列國考·東番考·物產》，頁70。

73 [明]鄭德瀟，〈番薯序〉，收入〔清〕萬友正修，〔清〕黃家鼎輯，《泉州府馬巷廳志》，中國方志叢書華南地方福建省第98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據清乾隆41年修、光緒19年重校補刊本影印），卷12〈物產〉，頁96。

74 [明]徐孚遠撰，姚光輯，《釣磧堂存稿》，卷3〈五言古詩二·裂嶼〉，頁364。

75 [明]盧若騰著，吳島校釋，《島噫詩校釋》，〈蕃薯謠〉，頁103。

76 [明]楊英，《從征實錄》，頁186。

身。」他對土產柑果有「種出蠻方味作酸，熟來包燦小金丸」之評語，並對南臺灣出產的椰子，亦有詩云：「殼內凝肪徑寸浮，番人有法製為油。窮民買向燈檠用，祇為芝麻歲不收。」⁷⁷王忠孝則對臺灣荔枝獨有偏愛，從其詩〈東寧友人貽丹荔數十顆有作〉曰：「海外何從得異果，於今不見已更年。色香疑自雲中落，苞葉宛然舊國遷。好友寄緘嫌少許，老人開篋喜奇緣。餘甘分噉驚新候，遙憶上林紅杏天。」⁷⁸由此可反映出他吃到荔枝的興奮之情。

三、風土民情

來臺文士對於臺灣原住民也相當好奇與關注。盧若騰未見過原住民，但聽聞過「林箐深密處，土夷更猙獰。射人每命中，竹箭鉄鏢並」。⁷⁹鄭氏軍隊入臺不久，即與原住民發生衝突，《桃源魁斗謝氏族譜》有記：「及大將軍取東都，既定邑置郡，再踰月，南社群沸，一方騷動，都為不寧。」為此鄭成功召集文武官員商議對策，工官都事謝維獨排眾議，主張派兵三百，「改置土官，申立條約」，後來騷動果然消弭，謝維因此受到重用。⁸⁰

如何安撫土著，在新闢地和平共處，是明鄭治臺的施政重點。鄭經曾請盧若騰擬定文稿，告諭將士必須「招徠土番，咸受戎索；撫綏流寓，胥慶樂郊」。⁸¹但是鄭經抵臺不久，依舊發生北路土番阿狗讓亂，不得不派遣勇衛平復，之後還接連發生水沙連番、斗尾龍岸、沙轆番、大肚番各番社之亂，鄭經皆曾派部隊平剿，所以鄭經在〈咏昔年北征〉曰：「昔歲出師往北征，彎弓帶甲馬蹄輕。風吹旗旆龍蛇動，雪映刀兵日月明。荒草溪邊麋鹿隱，青

77 沈光文的〈釋迦果〉、〈番柑〉、〈番橘〉、〈椰子〉等詩文可參見龔顯宗編著，《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資料增補》，冊上，頁48–49。有論者以沈光文〈番橘〉詩中「枝頭儼若掛繁星，此地何堪比洞庭」，認為他不曾見過洞庭湖，對臺灣異域缺乏好奇興趣。這個論點可能是不解「洞庭橘」典故，亦不知太湖流域的洞庭東西兩山位置，而產生望文生義的捉影誤解。

78 [明]王忠孝著，《惠安王忠孝公全集》，卷11〈詩類·東寧友人貽丹荔數十顆有作〉，頁251。

79 [明]盧若騰著，吳島校釋，《島噫詩校釋》，〈東都行〉，頁69。

80 參見《桃源魁斗謝氏族譜》（民國30年重修刊本），卷4〈土房紀實〉，頁16b–17a，引自莊為璣、王連茂編，《閩臺關係族譜資料選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8月），頁415。

81 [明]盧若騰著，吳島校釋，《島噫詩校釋》，〈代延平王嗣子告諭將士〉，頁343。

松山裏鷗鴟驚。猶須武將宣威力，一曲長歌奏凱聲。」⁸²就是在追述渡臺征剿番社的戰果。沈光文僻隱群山間，身居番社，更是常接觸到原住民，故他在〈番婦〉詩深刻描述：「社裏朝朝出，同群擔負行。野花頭插滿，黑齒草塗成。賽勝纏紅錦，新粧掛白珩。鹿脂搽抹慣，欲與麝蘭爭。」⁸³而徐孚遠在〈東寧詠〉詩云「土民衣服真如古」⁸⁴，可能他也見過原住民的裝扮，他還在〈白足婦謠〉中提及他在金廈諸島旅居時見到有人「舉體被番衣，紅布裹其顛」的扮相。⁸⁵但〈東寧詠〉詩中的「土民」或許是指涉早先年就已前來移墾的定居者。

關於明鄭時期的傳統節慶，亦可從旅臺文士的詩文中略知一二。至端午時節，「海天多雨濕端陽，閉戶翛然一枕涼」，此刻沈光文身處陌生的閩臺異域，不知何時能返鄉，難免會愁上加愁，正所謂每逢佳節倍思親，所以詩云「年年此日有新詩，總屬傷心羈旅時」。⁸⁶倒是鄭經的〈端午〉一詩刻劃出節慶歡樂氣氛：「土女滿沙洲，鼓聲出素流。風吹彩旆動，日映畫橈浮。爭勝喧江岸，奪標鬧浦舟，歸來天薄暮，齊唱過南樓。」⁸⁷由此可知明鄭時期也曾舉辦歡騰的龍舟競渡。到了中秋，觀賞明月更非比尋常，明清易代的士人常以日月繫詩比喻復明，中秋明月更彷彿希望圓滿無窮，王忠孝在臺灣度中秋就有這樣的感受：「今夜東州月，初升色皎皎。晴空杳無雲，碧曜當天炤。四顧望霽輝，萬戶爭歡叫。爝火難為光，餘氛莫敢攬。天公似有意，明興為之兆。」⁸⁸

另一個很值得觀察的現象，就是到了冬季，南臺灣還下起霜雪，如鄭經的〈初冬〉描述他十月初冬登樓遠望的觀感：「江上草木多淒楚，殘菊落

82 [明]潛苑主人(鄭經)，《東壁樓集》，卷4〈七言律·咏昔年北征〉，頁2a。

83 [明]沈光文，〈番婦〉，收入龔顯宗編著，《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資料增補》，冊上，頁52。

84 [明]徐孚遠撰，姚光輯，《釣磧堂存稿》，卷15〈七言律詩四·東寧詠〉，頁572。

85 [明]徐孚遠撰，姚光輯，《釣磧堂存稿》，卷2〈五言古詩·白足婦謠〉，頁353。

86 [明]沈光文，〈癸卯端午〉，收入龔顯宗編著，《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資料增補》，冊上，頁47。

87 [明]潛苑主人(鄭經)，《東壁樓集》，卷3〈五言律·端午〉，頁20b。

88 [明]王忠孝著，《惠安王忠孝公全集》，卷11〈詩類·東寧中秋有感〉，頁247。

英飛滿階。霜雪紛紛何飄墜，空山樹影半沉埋」。學者據此指出，這種現象很可能是17世紀中葉，人口少，草萊初闢，林木多，氣溫自較現代低的結果。⁸⁹不過也該注意古人詩文寓意往往大於寫實，這或許是反映其觸景傷情的詩歌意象。但是17世紀臺灣確實也有降雪的紀錄，例如清康熙朝首任諸羅知縣季麒光奉調入臺後，在歲末之際就親身經歷「西風涼雪漫相催」。⁹⁰風霜雨雪交加之下，當地人「皆云數十年來所未有」，是難得一見的景象，沈光文因此「詩以紀異」，季、沈兩人還相互和韻。⁹¹

伍、感懷、思鄉與政治疏離

近年學者分析易代之際，士大夫首先面臨到生與死的抉擇，進而有殉國、起義、歸隱、仕敵等種種行為。⁹²改朝換代後，許多士大夫還因憔悴悔罪而展現消極的行為。⁹³近年學界也開展一些細緻性的分析，從個人延伸到生活圈與交友圈，乃至區域群體的研究。⁹⁴其中有論者指出，部分研究忽視明末士大夫可作為的選擇——即來臺生活，來臺文士只有抉擇是否要依附鄭氏來臺，來到臺灣並沒有臣服滿清的問題，亦無夷夏之防的強烈要求，故不須經歷種種痛苦抉擇。⁹⁵不過，要注意的是，因為來臺文士多來自於東南沿

89 袁顯宗，〈從《東壁樓集》看鄭經與臺灣〉，頁53。

90 〔清〕季麒光撰，李祖基點校，《蓉洲詩文稿選輯·東寧政事集》，〈除夕見雪和斯菴〉，頁44。

91 〔清〕季麒光撰，李祖基點校，《蓉洲詩文稿選輯·東寧政事集》，〈仲冬晦日，風雨大作，詢之土人，皆云數十年來所未有。斯菴居此最久，詩以紀異，因韻和之〉，頁45。

92 何冠彪，〈生與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擇〉（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10月）。

93 王汎森，〈清初士人的悔罪心態與消極行為——不入城、不赴講會、不結社〉，收入王汎森，《晚明清初思想十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12月），頁187-247。

94 王成勉，〈再論明末士人的抉擇——近二十年的研究與創新〉，收入氏著，《氣節與變節：明末清初士人的處境與抉擇》（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3月），頁15-31。關於明清之際遺民群體在海外的活動，可參見韓國學者吳一煥，《海路·移民·遺民社會——以明清之際中朝交往為中心》（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9月）的研究。

95 徐一智，〈明遺民的抉擇與處境——以王忠孝、李茂春、沈光文為例〉，中壢：「『明清變動社會的探討』青年學者論文發表會」，2005年5月28日。

海地區，依附鄭氏來臺並非是選項，而是因緣際會、理所當然的行為。⁹⁶事實證明來臺生活的文士動向，同樣都有出仕、逃禪與隱居的行為，甚至是投敵，均無異於其他地區。倒是這些文士們在臺強烈寄託主政者領導，滿懷反清復明的心情，以及遠離家園來到化外之地的百感交集，可能會比在他處者更為濃厚些，但當期待落空，也更加失落。

一、鞏固士氣

早先文士渡臺並無久居打算，他們所期待的無非是趕緊光復故土、重返家園。雖然永曆帝朱由榔（1623－1662）早在鄭經入臺不久就遭遇害，唐王（1602－1646）、魯王（1618－1662）等明宗室亦已相繼故去，但鄭氏祖孫三代在臺仍奉明正朔，力行大明典制，這在其他地區幾乎不得見，這正是王忠孝願意赴湯蹈火的原因：「問余何事渡橫流，為箇綱常割不休。歲曆忽頒懷舊闕，春英乍放警新籌。」⁹⁷王忠孝還在〈居東首春遙祝聖躬二首〉詩中表達忠誠之心：

紫極映黃道，垂裳奠異封。曆綿國步遠，地迥歲華濃。天意護漁藻，臣心儼鎬雍。遐方布淑氣，海外猶朝宗。

運轉乾坤正，春臨萬象知。日輪垂照邈，皇曆錫恩遲。聖德方懷遠，天高或聽卑。小臣無以報，遙挹漢官儀。⁹⁸

況且，部分明宗室也跟隨鄭氏入臺，尤其是寧靖王朱術桂（1617－1683）「艱辛避海外，祇為數莖髮」，最終也選擇在南臺灣的赤崁落腳。⁹⁹文士與朱術桂往來頻繁，無非將之視為明祚的延續，正如徐孚遠在未入臺前所作的〈陪寧靖集王愧兩齋中〉詩句裡就表示：「軒車夕過喜王孫，呼取黃衫共酒

96 所以施琅會論斷：「但賊多係閩地之人，其間縱使有心投誠者，既無陸路可通，又乏舟楫可渡，故不得不相依為命。」〔清〕施琅撰，王鐸全校注，《靖海紀事》，卷上〈盡陳所見疏〉，頁54。

97 〔明〕王忠孝著，《惠安王忠孝公全集》，卷11〈詩類·東方首春有懷〉，頁248－249。

98 〔明〕王忠孝著，《惠安王忠孝公全集》，卷11〈詩類·居東首春遙祝聖躬二首〉，頁248。

99 〔清〕夏琳撰，《海紀輯要》，卷3，頁78。

樽」、「飲罷不須愁倒極，還期珍重在中原！」¹⁰⁰

理所應當的，如何鞏固反清的士氣與民心，主政者的決心相當重要。鄭經的詩文不斷地表達出其堅定立場：

胡虜腥塵遍九州，忠臣義士懷悲愁。既無博浪子房擊，須效中流祖逖舟。故國山河盡變色，舊京宮闕化成丘。復仇雪恥知何日，不斬樓蘭誓不休。¹⁰¹

萬里關山月，長照征夫袖。碧漢絕纖雲，清輝如白晝。明月故鄉同，山水異方秀。城頭夜柝鳴，空山啼猿狹。旌旗卷暮煙，畫角熒朝宿。將軍不解甲，令嚴謹烽候。何日靖胡氛，歸獻單于首。¹⁰²

詩句中皆透露著鄭經在臺灣復仇雪恥、驅逐滿清的志向，他不斷地枕戈待旦，用實踐來完成收復失土的諾言。當鄭經得知吳三桂（1612－1678）西南起事，「滿喜又心驚」，此際興奮之情亦見於詩歌：

群胡亂宇宙，百折守丹誠。海島無鸞信，鄉關斷雞聲。義師興僰岫，壯氣撼長鯨。旗旆荊襄出，刀兵日月明。一聞因色動，滿喜又心驚。願掃腥膻幕，悉恢燕鎬京。更開朝貢路，再築受降城。¹⁰³

1674年鄭經領軍渡海西征，果有收復部分漳、泉故土之舉，他還率文武官僚至泉州，展示必成決心，故有詩云「薄出西征駕戰舟，長歌擊楫濟中流。國家元運今朝復，胡虜妖氛一旦收。萬姓歡呼恢漢室，孤臣喜得見神州」。¹⁰⁴

100 [明]徐孚遠撰，姚光輯，《釣璜堂存稿》，卷13〈七言律詩二·陪寧靖集王愧兩齋中〉，頁536。

101 [明]潛苑主人（鄭經），《東壁樓集》，卷4〈七言律·悲中原未復〉，頁4a-b。

102 [明]潛苑主人（鄭經），《東壁樓集》，卷1〈五言古·關山月得袖字〉，頁24b。

103 [明]潛苑主人（鄭經），《東壁樓集》，卷5〈五言排律·聞西方反正喜詠得誠字〉，頁14b。

104 [明]潛苑主人（鄭經），《東壁樓集》，卷4〈七言律·和康甫應天討虜大海出師〉，頁28a。

二、漂泊感懷

不幸的是「臺灣居，大不易」，挨餓受困是來臺文士普遍的共同經驗。沈光文流移時經常三餐不繼，這種飢寒交迫的遭遇，使得他的詩總帶些許感傷：「卻恨餓來還不死，欲添長命縷何為？」¹⁰⁵在臺的生活困境，遠非外人能想像，昔日士人在金廈就已感受到烽火連天之地「彼此賦役重，名色並繁雜」，¹⁰⁶甚至「丁錢既已徵，望屋算突煙。尚有無名稅，飛檄正紛然」。¹⁰⁷沒想到在臺賦役不減，生活備嘗艱辛。王忠孝雖然表現的處之泰然：「風霜飽喫未甘休，強把健頑度亂流。四顧長天渺無際，坐看牛斗任悠悠。歷盡波濤剩一舟，生涯計拙也無求。由來素食驚貧骨，擬把漁竿當西疇。」¹⁰⁸但實際上，生活病痛的苦楚，迫使他還是向內地家人提出接濟的要求。¹⁰⁹

臺灣的生活不順遂，極易催生文人的思鄉情愁。如王忠孝「棄家入殊域，念國廿餘年」，經常午夜時「不寢憶前事，渾如蝶夢中」。¹¹⁰在「家園入夢都成幻，臥聽雞聲鬧客廬」的局面下，¹¹¹他不鼓勵家人來臺，反促兒孫在老家避居：「我今應如此，兒曹勿猶夷。膚髮我何有，香火爾應持。好速攜孫去，篤志守墳廬。世亂多離別，苦辛靠天知。」¹¹²甚至這種思鄉之情，也在臺灣主政者鄭經的數首詩句中能見到：

望日懷鄉國，臨流想故丘。烟霞日作偶，風月夜相酬。萬里奔
馳客，千波浮泛鷗。雲山淒晚色，對景不勝愁。¹¹³
登樓倚碧檻，仰首問青天。滄海無窮際，故園何處邊。寸心同

105 [明] 沈光文，〈癸卯端午〉，收入龔顯宗編著，《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資料增補》，冊上，頁47。

106 [明] 盧若騰著，吳島校釋，《島噫詩校釋》，〈老乞翁〉，頁43。

107 [明] 徐孚遠撰，姚光輯，《釣磧堂存稿》，卷2〈五言古詩·白足婦謠〉，頁353。

108 [明] 王忠孝著，《惠安王忠孝公全集》，卷11〈詩類·東行〉，頁246。

109 [明] 王忠孝著，《惠安王忠孝公全集》，卷2〈文類·另囑〉，頁44。其中提到「我欲用參，須為我求二三兩先來，切切。十二日父子字。」

110 [明] 王忠孝著，《惠安王忠孝公全集》，卷11〈詩類·臥茅齋有思〉，頁249。

111 [明] 王忠孝著，《惠安王忠孝公全集》，卷11〈詩類·近況〉，頁245。

112 [明] 王忠孝著，《惠安王忠孝公全集》，卷11〈詩類·促兒孫入山〉，頁249。

113 [明] 潛苑主人（鄭經），《東壁樓集》，卷5〈五言排律·江行有懷〉，頁5b。

水遠，幽夢與雲連。世事時更改，人情日遞遷。消愁書史外，寄興山河前。明月隨孤影，清風入五絃。登樓懷遠望，望遠豈徒然。¹¹⁴

不論是望景或是思故，總有若干惆悵，鄭經也只能以詩文傾訴，暗自堆愁神傷。如同朱鴻林所分析，在臺灣的歲月，讓鄭經從原本是風流倜儻的亂世公子，磨練為一派外表放曠退隱而心裡愁悶難排的多寓傷懷，其雅事是真憂多於真樂。¹¹⁵

漂泊不定的感懷，往往會隨著時間的流逝不斷地發酵而更加怨嘆，徐孚遠曾流徙金廈等地，在外島「僑居又幾春」之餘，還向友人自怨自嘆比擬「授廩雖各島，同是作逋臣！」¹¹⁶1662年仲秋之際，徐孚遠想前往臺灣，卻因天候不佳無法成行，〈東行阻風〉一詩就感嘆自己「身世何堪常作客，飄搖難禁屢書空」。¹¹⁷等待多日，失望無奈，對於臺灣的消息只能道聽塗說，表示將「身遊東海學耕田」，卻「更聞東海風土惡，居人往往不生還」，所以他會嘆曰「今日可憐真可憐！」¹¹⁸不久他雖然順利從金廈等島東渡抵臺，但在歲月催人老、故國舊臣逐漸凋零下，難免會想到「昔日衣冠今渺茫，島居一紀又褰裳」。¹¹⁹沈光文不敢回想這段漂泊經歷，〈感憶〉詩云「苦趣不堪重記憶，臨晨獨眺遠山青」。¹²⁰王忠孝也有類似的感傷，在〈渡

114 [明]潛苑主人(鄭經)，《東壁樓集》，卷5〈五言排律·登樓〉，頁7a。

115 朱鴻林，〈鄭經的詩集和詩歌〉，頁228-229。

116 [明]徐孚遠撰，姚光輯，《釣磧堂存稿》，卷8〈五言律詩一·贈曾則通〉，頁450。

117 [明]徐孚遠撰，姚光輯，《釣磧堂存稿》，卷15〈七言律詩四·東行阻風〉，頁571。關於徐孚遠的渡臺時間，學界看法紛歧，蔡靖文論證時間大致是1662年10月下旬，停留近一年。而潘承玉認為徐孚遠入臺兩次，時間分別是1661年4月-12月，以及1662年11月頃。本文暫採蔡靖文的見解，且徐孚遠1661年9月中旬在為張煌言《奇零草》題序時人正在廈門寓所，他是否曾隨鄭成功從征渡臺，尚待更多史料判定。以上參見蔡靖文，〈由《釣磧堂存稿》試探徐孚遠入臺之相關問題〉，《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新68期（2007年5月），頁50-67。潘承玉，《南明文學研究》，頁369-381；郭秋顯，〈徐孚遠生平及作品〉，收入郭秋顯選注，《徐孚遠·王忠孝集》，臺灣古典作家精選集2（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2年12月），頁25-28。

118 [明]徐孚遠撰，姚光輯，《釣磧堂存稿》，卷7〈七言古詩三·今日〉，頁444。

119 [明]徐孚遠撰，姚光輯，《釣磧堂存稿》，卷15〈七言律詩四·擬柬書懷〉，頁571。

120 [明]沈光文，〈感憶〉，收入龔顯宗編著，《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資料增補》，冊上，頁58。

海羈棲〉一詩云：「奔忙歲月亦云深，鬢裡繁霜肅氣侵。既少隆中豫定略，如何梁甫作幽吟。殊方林壑驚峩峩，故國黍苗嘆鬱森。年老羈棲知曷極，好堅末節不移心。」¹²¹明鄭晚期入臺的諸葛晃更有強烈思鄉與不平之情：

緬思同學少年，俱盛五陵衣馬，而某尚作羈人遷客，冷落於荒煙衰草，望知己於雲中，思故鄉若天上。每皓月圓時，悲風起處，登高北望，目與天盡。¹²²

大概是出於壯志未酬，抱負難伸，使得他一再思鄉心切。即使已政權易主，他對友人還是灰心喪志的表示：「言歸之期，杳然未卜，蓋此間人從無有敢作此想者，當聽諸造物耳！」¹²³

對於週遭文士的感傷，身為延平世藩的鄭經並非毫無察覺，他也在〈秋夜書懷〉裡寫道：「渡海今十載，未能大披膽。歲歲轉相催，憂心自慘慘。」¹²⁴其詩〈自嘆〉即反映其無奈，只待他日「奮翼高騰大海東」。¹²⁵因為來臺多時，卻總是落得徒勞無功，真是愁上加愁，不知何時才能心想事成：「渡海東來忽幾秋，勳名未遂不勝愁。臥龍猶復待雲雨，有日高飛遍九州。」¹²⁶如此心境，讓鄭經輾轉難眠，「夜闌不寐常獨坐」，只得「頻聽江頭海濤喧，愁思不已姑飲酒」。¹²⁷但即使借酒澆愁，可是「醉餘胆苦自忡忡」，總又回想昔日江山而「無限愁腸成百結」。¹²⁸

三、失望無奈

然而事實上，鄭經與其他的在臺士人相處並不融洽，可說文士逐漸產

121 [明]王忠孝著，《惠安王忠孝公全集》，卷11〈詩類·渡海羈棲〉，頁249。

122 [清]諸葛晃，〈臺灣答友人書〉，收入[清]陳國仕輯錄，《豐州集稿》，冊上，頁221。

123 [清]諸葛晃，〈臺灣答友人書〉，收入[清]陳國仕輯錄，《豐州集稿》，冊上，頁222。

124 [明]潛苑主人（鄭經），《東壁樓集》，卷1〈五言古·秋夜書懷〉，頁7b-8a。

125 [明]潛苑主人（鄭經），《東壁樓集》，卷4〈七言律·自嘆〉，頁5a。

126 [明]潛苑主人（鄭經），《東壁樓集》，卷8〈七言絕·自嘆自想〉，頁2b。

127 [明]潛苑主人（鄭經），《東壁樓集》，卷2〈七言古·雲山〉，頁2a。

128 [明]潛苑主人（鄭經），《東壁樓集》，卷4〈七言律·江山非故園〉，頁13a；卷4〈七言律·嘹唳黃昏知雁過〉，頁10b。

生的感懷與傷心，部分是出自於對主政者的失望與無奈；而身為領導人的鄭經，也常為臺灣內部的人事環境不滿，其詩文充滿許多對時人時事的傷感和憤慨之言。

起初多數文士願意依附在鄭成功的麾下，主要是由於「志士尊聲氣，東都重縉紳」。¹²⁹未料不出數年卻已物換星移，鄭成功去世後，鄭氏陣營產生內鬭，權力鬥爭激烈，徐孚遠抵臺時就「忽聞羣帥意參商，兩雄不並勢難量」。¹³⁰鄭經嗣位之後對來臺遺老又是另一種態度，就連對已不參與政事、日以耕讀自遣的寧靖王朱術桂，待遇都「歲衰於禮」，甚至衣食之資也取消。對此沈光文極為同情，形容寧靖王「海外依人半受嫌」，其住所週遭是「尋路入來皆茂草」。¹³¹其他來臺文士後來也多歸隱山林，如葉后詔，以詩酒自娛。¹³²顧祩在臺任官一年餘，參與過海峽兩岸議和的談判事務，但是從沈光文贈詩提到「明知苦節卻艱貞」、「色言欲避笑愚生」，顧祩的官宦生

129 [明] 沈光文，〈寄懷莊檉庵〉，收入龔顯宗編著，《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資料增補》，冊上，頁55。

130 [明] 徐孚遠撰，姚光輯，《釣璜堂存稿》，卷7〈七言古詩三·臥病〉，頁446。

131 [明] 沈光文，〈往寧靖園亭修謁〉，收入龔顯宗編著，《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資料增補》，冊上，頁62。

132 謝正光、范金民編，《明遺民錄彙輯》，頁941。

涯似曾受流言所擾，最後決定移居南路，入山終老。¹³³李茂春在臺灣以誦經唸佛度日，構築夢蝶園作為逃禪焚修的場所。¹³⁴

徐孚遠來臺時間更是短暫，在1663年10月清軍攻入金、廈前，即已攜子離臺而去往潮州，亦不再追隨鄭經退守臺灣。¹³⁵失望頓挫的他最後向同行門生朴懷玉道別離：「世已無王誰作主？身居絕地更何攀！」因為永曆帝、魯王等領導人均已辭世謝幕，在大陸的抗清事業遂成破滅幻影，那麼在猶如絕地的臺灣還能寄託誰呢？所以乘船離開時「同掛風帆心緒亂，未由握手話時艱」，兩人就此互奔前程。¹³⁶而朴懷玉曾和師友們在臺共同相聚慶生，

133 [明] 沈光文，〈別顧南金〉，收入龔顯宗編著，《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資料增補》，冊上，頁61；唐立宗，〈明鄭東都承天府尹顧祩生平事略考〉，頁20。關於沈光文與顧祩的交誼，潘承玉教授另有不同的看法，最初他推敲沈光文贈詩是1662年顧祩（顧南金）將往南路的赤崁城，而沈光文則將前往北路兩人分別時所作，認為他們早在1654年於金門相識，至1662年已有長達9年的交誼。近年潘氏修正前說，表示該詩的「入山地近區南北」則是指在金門的南山、北山，當是順治17年（1660）夏初所作，與臺灣無關。參見潘承玉，〈神話的消解：詩史互證澄清一樁文化史公案〉，《復旦學報》，2期（2008年6月），頁131–139；《南明文學研究》，頁359–366。潘教授論著有諸多精闢見解，惟部分詩史囿於定調結論，考證虛實交雜，或有牽強解釋，如（1）顧祩在廣東的幕賓主是李棲鳳而非李率泰，因李棲鳳在出任廣東巡撫前任浙江杭嘉湖道，而顧祩在順治2年到4年間做的是浙江糧儲道，兩人有同省、同級同僚之誼，所以顧祩順治6年被削職後，投奔該年擢昇廣東巡撫李棟鳳是合情合理。按：清初李棟鳳原在山東、湖廣、安徽等地任官，直到順治5年5月方從安徽巡撫降調浙江杭嘉湖道，順治6年5月擢昇廣東巡撫；而顧祩則是在順治2年降清，至4年4月從浙江糧儲道調任福建按察使僉事，7月頃在福建浦城因失職遭到羈押。亦即清初李棟鳳與顧祩的仕途並無交集之處，反倒は李率泰在順治2至3年間隨軍南征，招撫南明文武官員，很可能因此與當時降清的顧祩有過接觸。（2）指出顧祩在廣東作幕賓，因順治13年李棟鳳以廣東巡撫超拜兵部尚書，並代理李率泰改調浙閩總督而留下的兩廣總督職缺，身價徒漲，使得顧祩不願再仰其鼻息，轉而求去。按：李棟鳳是順治15年才超拜兵部尚書，其間在順治13年4月護理總督職僅1月光景，隨兩廣總督王國光到任即不再代理其職務，故顧祩離去之說並不合情理。（3）以成語「南金東箭」推論顧南金就是顧偉男，徐孚遠《釣璜堂存稿》與閻爾梅《白耷山人詩集》均有顧偉男的蹤跡。按：據潘氏引述的閻爾梅《白耷山人詩集》卷6作〈雲間諸子集飲徐武靜齋中，賦詩較勝，喜而志之，時有張兆侯、吳六益、顧偉男、張昊東，餘不悉記〉可知，諸子均為雲間人（松江華亭），而華亭人顧開雍的表字是偉南，眾所周知，與同鄉徐孚遠均為雲間幾社成員，偉男只不過是同音之誤而已，這在古籍史料很常見；而顧祩是浙江台州人，顧偉男與顧南金兩人無法相提。

134 黃典權，〈夢蝶園主李茂春〉，《臺南文化》，2卷1期（1952年1月），頁127–131。

135 蔡靖文，〈由《釣璜堂存稿》試探徐孚遠入臺之相關問題〉，頁59–60。

136 [明] 徐孚遠撰，姚光輯，《釣璜堂存稿》，卷15〈七言律詩四·別朴孟珍〉，頁572。

「耆英作社大荒東，次第銜杯興味窮」，詩酒言歡，其樂融融。¹³⁷朴懷玉是武職世家子弟，深受徐孚遠賞識，可是他返回大陸後卻是選擇仕清，儼然辜負師長的生前期待，箇中情由，當是百般複雜且又無奈。¹³⁸另一方面，無法離開臺灣的沈光文則對鄭經諸多舉措相當不滿，作賦譏諷，以致幾罹不測，只得「改服為僧，入山不出」。¹³⁹因此施琅（1621－1696）研判鄭經之所以能長期抗清，「馭數萬之眾，非有威德制服，實賴汪洋大海為之禁錮」。¹⁴⁰

同樣鄭經對渡臺遺老亦不諒解，寒風中讓他不由得想起人情之多變：「曉起蕭蕭風帶寒，人情反覆路行難。愁思任是千飛絮，世俗猶然冷眼看。」¹⁴¹其詩文不斷地強烈表示：

避塵島上春十更，諸人半屬朝公卿。空落天子死社稷，廷臣惟
有歎數聲。風波不歷徒言苦，百折未經何忠貞。亦有松柏終歲暮，

137 [明]徐孚遠撰，姚光輯，《釣璜堂存稿》，卷20〈七言絕句三·仲冬二十五日余誕日，以前朱君，以後王君、朴君皆以誕日舉觴，歌以記之〉，頁615。郭秋顯指出此為開設社學教育。而潘承玉認為這應當是明鄭最早一批寓公詩人所組的一個詩社。參見郭秋顯選注，《徐孚遠·王忠孝集》，頁129-131；潘承玉，《南明文學研究》，頁380。

138 關於朴懷玉的生平、出處，學者郭秋顯略有討論，可從徐孚遠的高徒王漥〈東海先生傳〉中得知，當王漥遊楚時，遇到「楚有郡守朴君懷玉，自稱先生弟子也」，即朴懷玉就是徐孚遠在海外的「異域子弟」。按：再查閱湖北志書如康熙《雲夢縣志》可知，朴懷玉曾在康熙7年（1668）為縣志作序，自稱「德安府同知署雲夢縣事三韓朴懷玉」。在該志的修志姓氏中，還有更明確的身份資料：「同知署雲夢縣事朴懷玉，孟珍，遼東東寧人，廕生。」足可印證朴懷玉就是朴孟珍。令人好奇的是，遼東人朴懷玉怎麼會來到閩臺地區呢？我們可從楊英的《從征實錄》去推敲，在鄭成功用兵之際，唯一的朴姓將領就是朴世用，他是在1654年11月初隨漳州協守清將劉國軒等共同歸降，被授予統領廈門水武營的訓練。但在1658年9月，有傳言北兵將叛，「營中偶語紛紛」，鄭成功命令朴世用等將領「歸謝兵柄」，這場事件影響頗大，還有的將領「以心跡不明，遂忿激氣死」，而朴世用則是在1659年7月的北征鎮江之役中喪生。朴世用為北人，朴懷玉很可能就是朴世用的家屬，或曾入育胄館。徐孚遠詩稱：「有友朴公子知我。」又稱：「羨君年少有英姿，擐甲鳴弓未世奇。張氏金貂傳世業，謝家玉樹長新枝。」可見很是欣賞這位武職世家子弟。參見郭秋顯選注，《徐孚遠·王忠孝集》，頁130-131；〔清〕王漥，〈東海先生傳〉，收入諸家著，《徐闔公先生年譜》，〈附錄一〉，頁65；〔清〕陳夢舟修，〔清〕張奎華纂，《雲夢縣志》，清代孤本方志選第2輯·湖北22（北京：線裝書局，2001年據清康熙7年刻本影印），頁14、74；〔明〕楊英，《從征實錄》，頁71、121、134、162；〔明〕徐孚遠撰，姚光輯，《釣璜堂存稿》，卷6〈七言古詩二·醉月歌贈朴孟珍〉，頁430、卷14〈贈朴孟珍〉，頁543。

139 [清]季麒光撰，李祖基點校，《蓉洲詩文稿選輯·東寧政事集》，〈沈光文傳〉，頁123。

140 [清]施琅撰，王鐸全校注，《靖海紀事》，卷上〈盡陳所見疏〉，頁54。

141 [明]潛苑主人（鄭經），《東壁樓集》，卷8〈七言絕·曉思〉，頁9a-b。

半如蜉蝣求此生。安危未至先人望，患難臨頭已自行。人言反覆偏無定，蓋棺纔定死後名。¹⁴²

鄭經認為若復國逐漸無望，則士子也應該有責任，尤其是臺灣「世情日趨下，風景異古初。習俗多驕悍，善道弗鑑繙。朋黨互相稱，崛強者揮鋤」，焦思紛雜，讓他更難入睡。¹⁴³就連徐孚遠都觀察到：「樹纛諸公多前卻，十八年來盡蕭索。不歎中原氣衰，還愁真宰精靈薄。」¹⁴⁴王忠孝在〈自狀〉中回憶「同事諸公，水火互爭」，以致於金廈兩島淪陷，「居民掠殺甚慘」。¹⁴⁵世風日下，落到猶如絕境的下場，諸公文士確實是無法卸責的。

即使如此，鄭經內心仍盼望士子能復出協助，在〈招隱〉詩中云：「丹詔時頻訪，玄纁日已頒。」不過招攬避塵隱士的結果竟是「棲鳥復驚還」。¹⁴⁶其詩常有形容隱者或訪隱之題，卻也有「尋隱者不遇」之喻。¹⁴⁷率軍西征時，他在金門向祖宗之靈承諾：「竊以舉大事者，當收拾人心，籠絡英傑；若光復伊始而驟報私讐，恐非所以激勵天下士也。」¹⁴⁸在臺灣，他還曾向逃禪的李茂春一再暗示：「先生何所懼，所懼在蟻匿」、「不來皆有因，色荒為人賊。莫若反諸躬，休如螻蟻食」。¹⁴⁹即譬喻人若像田裡的蟻蟲，「數百無非賤，計千亦不貞」，藉由賦詩唱和希望李茂春不要再學蟻蟲隱匿，當然這還是一種溫和友好的互動。¹⁵⁰可是李茂春似乎無動於衷，康熙《臺灣府誌》稱李茂春「知經非令器，素不加禮」。¹⁵¹顯然遊說無望，鄭經

142 [明]潛苑主人(鄭經)，《東壁樓集》，卷2〈七言古·讀喜達集有感依諸公韻成篇〉，頁20b。

143 [明]潛苑主人(鄭經)，《東壁樓集》，卷1〈五言古·卜居〉，頁14a。

144 [明]徐孚遠撰，姚光輯，《釣磧堂存稿》，卷7〈七言古詩三·諸公〉，頁446。

145 [明]王忠孝著，《惠安王忠孝公全集》，卷2〈文類·自狀〉，頁39。

146 [明]潛苑主人(鄭經)，《東壁樓集》，卷3〈五言律·招隱〉，頁17b。

147 [明]潛苑主人(鄭經)，《東壁樓集》，卷4〈七言律·尋隱者不遇〉，頁21a-b。

148 [明]鄭經，〈皇明石井鄭氏祖墳誌銘〉，收入何培夫主編，《金門馬祖地區現存碑碣圖誌》(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99年6月)，頁130。

149 [明]潛苑主人(鄭經)，《東壁樓集》，卷1〈五言古·和李正青憂蟻懼得匿字〉，頁28a-b。

150 [明]潛苑主人(鄭經)，《東壁樓集》，卷3〈五言律·和復甫詠蟻戲贈李正青〉，頁22b-23a。

151 [清]蔣毓英撰，《臺灣府誌》，卷9〈人物·縉紳流寓·李茂春列傳〉，頁382。

也只能對監國陳永華笑稱「不期李君反人情，卻與蝗虫成莫逆」、「愛彼以為席上珍，視我如遺徒倦客」。¹⁵²

及至清廷平臺前夕，旅臺文士對明鄭的支持已不若昔日。當鄭經驟逝、政局動盪之際，還發生傅為霖（？ - 1682）、廖康方洩密通敵事件。¹⁵³雖然傅氏等涉事者因此被逮處以極刑，家屬遭到發配流放，但是民間卻甚為同情。尤其是傅為霖的女兒為此自殺，「從死最烈」，有人認為「惜哉，傅女可無死也！」諸葛晃還指出「傅女死節，非死父也」，其真相是「以沒入陳將之家也」，所以「惟以死自全」，透露出明鄭時期殘酷無情的株連待遇。¹⁵⁴無獨有偶，黃棄娘是黃堂壯之女，年19，嫁給傅為霖的次子傅璇，棄娘得知夫婿亦遇害後，遂決意身殉而死，當時「聞者哀之」。¹⁵⁵可見明鄭後期來臺的文士已出現離心離德的現象，社會內部亦有矛盾，上下間無法齊心，甚至誤會未能消弭，成為鄭氏政權在臺的最大危機。

陸、結語

明清之際鄭氏父子相繼入臺，無疑是開啟臺灣歷史的新頁。雖然時人對地處荒僻的臺灣印象不佳，但文士的步履已逐漸揭開臺灣神秘的面紗，於是「華人遂接踵而來，安平東寧，所見所聞，無非華者。人為中國之人，土則中國之土，風氣且因之而轉矣」。¹⁵⁶也證明鄭成功渡臺的決策影響甚深。對於鄭氏渡臺決策與反對聲浪，黃宗羲（1610 - 1695）曾作了中肯的評論：

152 [明]潛苑主人（鄭經），《東壁樓集》，卷2〈七言古·和復甫怒螺歌贈李正青依磧字韻〉，頁42a。

153 [清]姚啟聖，《憂畏軒奏疏》，〈為報明事〉，「康熙二十年五月十九日上奏」，收入《明清臺灣檔案彙編》，第1輯第8冊（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4年），頁325 - 327。

154 [清]諸葛晃，〈為孝烈傅氏女乞言〉，收入〔清〕陳國仕輯錄，《豐州集稿》，冊下，頁462。

155 [清]高拱乾纂輯，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65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年），卷8〈人物志·貞節〉，頁215。

156 [明]王忠孝著，《惠安王忠孝公全集》，卷2〈文類·東寧上帝序〉，頁22。

鄭氏不出臺灣，徒經營自為立國之計，張司馬作詩誚之；即有賢鄭氏者，亦不過躋之田橫、徐市之間。某以為不然！自緬甸蒙塵以後，中原之統絕矣；而鄭氏以一旅存故國衣冠於海島，稱其正朔。¹⁵⁷

縱使張煌言反對勸諫，但正因為鄭氏父子堅持明朔，仍獲得渡臺文士的響應支持，遂能打下一片天地，留存故國衣冠，得以順利推動政經與文教事業，進而有長期對抗清朝政權的本錢。

對於明清之際的渡臺文士，後人對其評價很高。如《魯之春秋》有云：「海外諸臣，流離窮島，蓋又古來忠臣義士之一變局也。」¹⁵⁸而渡臺文士多來自福建漳泉等地，他們來臺時間大致可分4期。第一期為先於鄭成功入臺者，第二期是1661年跟隨鄭成功攻臺，第三期是1662－1664年跟隨鄭經渡臺者，第四期則是1674年鄭經西征之後來臺者。這些文士除了鄭氏父子以及監國陳永華等人在當政外，其餘多因久遭風霜、年近衰邁，普遍趨向平靜消沉，如黃典權（1924－1992）研究指出，當時士夫遺老大概有五類典型，第一類是肆意詩酒，求情感發洩的。第二類是像古代尋求渺茫的同情而放浪憑弔的。第三類是泰然自安而耕於隴畔的。第四類是比較積極而行醫濟世的。第五類是持齋念佛最為消極的。¹⁵⁹但值得觀察的是，旅臺文士的消極與隱匿，部分原因是出自於與當政者的不合，使得雙方感懷、思鄉的愁緒日增不減，無形中也損耗明鄭在臺的士氣。

明鄭時期各地的苦難動盪不僅是單方面的，因為許多渡臺文士拋家棄子的同時，也讓家鄉無數的人增添痛苦與惋惜。阮旻錫（1627－？）曾入鄭成功在廈門開辦的儲賢館，清軍攻陷金、廈兩島時，阮氏未能及時跟隨鄭軍渡臺，多年後，他特地到廈門海邊遙望邊際，只是「極目煙波外，難尋海上

157 [明]黃宗羲，《賜姓始末》，臺灣文獻叢刊第25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年），頁7。

158 [清]李聿求撰，凌毅標點，《魯之春秋》，卷11〈寺院三〉，頁119。

159 黃典權，〈夢蝶園主李茂春〉，頁129。

槎」，徒留連綿思念。¹⁶⁰隨著清朝統治政權的鞏固，以及雙方情勢的互相消長，有志反清之士逐漸沉寂，縱使怏怏不快，也無力反撲。可見政權的危亡存續與否，文士的動向佔有絕大的關鍵因素，因此明清之際渡臺文士的心境轉折、統治決策者的方略手腕，確實都值得吾人再三省思。

160 參見〔清〕阮旻錫撰，何丙仲校注，《夕陽寮詩稿》（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1年4月），〈阮旻錫詩文補遺・驚嶼〉，頁298。

渡海東來忽幾秋：明清之際渡臺文士的見聞與際遇

附表：明清之際來臺文士事蹟簡表

姓名	字號	籍貫	出身	文事	職位	抵臺簡記	參考資料
王忠孝 (1593-1666)	字長孺，號愧兩	福建惠安	崇禎1年進士	著《惠安王忠孝公全集》、《四居錄》	兵部左侍郎	永曆18年入臺，日與諸公肆意詩酒	《惠安王忠孝公全集》
甘孟煜	—	福建海澄	崇明伯甘輝子	善屬文，性明敏	儀賓、天興知州	民有欠糧數限不能完者，皆貸其債	《閩海紀要》卷下
朴懷玉	字孟珍	遼東東寧衛	廡生	離臺後參與康熙《雲夢縣志》、《池州府志》纂修	—	永曆16年底入臺，與徐孚遠吟詩唱和，離臺後降清	《釣璜堂存稿》卷20；康熙《雲夢縣志》
朱術桂 (1617-1683)	字天球	湖廣荊州	王室後裔	善書畫	寧靖王	永曆17年攜眷渡臺，墾竹港田數頃，明鄭議降時殉國	《臺灣外誌》卷29
吳鳳胎 (1605-1680)	字仲禎，號幹甫	福建龍溪	—	少而讀書，主持《大明中興永曆大統曆》考刊	占地官太史	永曆18年入臺	楊永智《明清時期臺南出版史》
李茂春 (?-1675)	字正青	福建龍溪	隆武2年舉人	富著述，風神秀整	參軍	永曆18年與渡臺，築草廬，日誦佛經	《明遺民錄彙輯》
沈光文 (1612-1688)	字文開，號斯庵	浙江鄞縣	經貢	著《草木雜記》、《臺灣輿圖考》、《文開詩文集》、《臺灣賦》、《流寓考》	太僕寺卿	漂流至臺灣，潛心著述，行醫授徒	《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資料增編》
沈佺期 (1609-1681)	字雲祐(雲又)，號復齋(鶴齋)	福建南安	崇禎16年進士	平生著作，其子孫輯而藏之	右副都御史	永曆18年入臺，杜門謝客，以醫術濟人	康熙《臺灣府誌》卷9
林英	字雲又	福建福清	崇禎歲貢	積學負文名	兵部司務	永曆16年4月至廈門，後又渡臺，削髮為僧	《廈門志》卷13；《明遺民錄彙輯》
林維榮	—	—	永曆9年育胄館出身	—	賓客司	永曆16年至臺；奉齋表至施琅軍前降	《閩海紀要》卷上
柯平 (?-1680)	—	福建晉江	育胄館出身	—	監紀、天興知縣、刑官	永曆15年從征至臺，從鄭經西征，數往來閩垣間	《閩海紀要》卷上、下
柯鼎開	—	福建晉江	刑官柯平之子	秀美能文，尤工詩賦	天興州知州、贊畫中書舍人	永曆15年隨父至臺。為知州時，愛惜士類，民亦戴之	《閩海紀要》卷下

臺灣文獻

65卷第2期

洪 旭 (1605-1670)	字念蓋 (念衷)， 號九峰	福建同安 (金門)	—	文武全才，曾撰 〈王忠孝傳〉	戶官、兵官	擁鄭經前往臺 灣，文事武備 多所弘益	《閩海紀 要》卷上
洪 磊	—	福建同安 (金門)	洪旭長子	—	吏官、兼理 戶官事務	抵臺任總聯絡 民社土番，受 鄭經重用	《閩海紀 要》卷下
洪士恩	—	福建南安	康熙11年 拔貢	—	—	永曆29年因 洪承疇家族緣 故，族人遭鄭 經執入臺	《海紀輯 要》卷2
紀 琮	—	福建同安	禮部主事 紀許國之 子	書丹〈上護軍驃騎 將軍蔣公墓誌銘〉	承宣司知 事、吏官都 吏	浪跡而東，為 延平郡王客	《廈門墓誌 銘匯粹》
徐孚遠 (1599-1665)	字闇公， 號復齋	南直隸華 亭	崇禎15年 舉人	著《釣璜堂存稿》	左副都御史	永曆16年底入 臺耕墾	《釣璜堂存 稿》
常壽寧	號雪嵩	南直隸金 山衛	官舍(武 職官員應 襲子弟)	與徐孚遠同鄉亦是 至交	察言司	永曆11年遭流 放至臺灣	《海上見聞 錄》卷1
張士樞 (1583-1682)	—	福建惠安	崇禎6年 副榜(貢 生)	日以書史自娛	—	永曆34年來 臺，杜門不 出，享高壽	《明遺民錄 彙輯》
張 瀾 (1587-1683)	字為三	福建同安	進士	—	兵部職方郎 中	永曆34年自廈 門渡臺	《明遺民錄 彙輯》
張 灑 (1598-1681)	字治五	福建同安	崇禎15年 舉人	—	工部司務	永曆34年自廈 門渡臺	《明遺民錄 彙輯》
張日曜	—	南直隸儀 真	忠匡伯張 進之子	—	長泰知縣、 天興知州	隨鄭經渡臺	《閩海紀 要》卷下
曹從龍 (?-1662)	字雲霖	南直隸華 亭	—	海外幾社六子之 一，著《曹雲霖詩 集》	監軍	永曆15年從征 入臺，後因擁 鄭襲嗣位而遭 斬	《張蒼水詩 文集》； 《臺灣詩 乘》卷11
許吉燝 (1618-1695)	字祥景， 號龜齋	福建晉江	崇禎16年 進士	—	刑部主事	與盧若騰同 舟，抵臺後 隱，勵節以終	《廈門志》 卷13
郭貞一	字元侯， 號道慤	福建同安	崇禎13年 進士	—	右都御史	負氣敢言，永 曆18年隨鄭經 入臺	《廈門志》 卷13
陳永華 (1634-1680)	字復甫	福建同安	弟子員	請建聖廟，立學 校，有遺集數卷， 曾撰〈夢蝶園記〉	咨議參軍、 監軍御史	永曆16年隨鄭 經至臺，親歷 南北，行屯田 墾荒，又開糖 鹽之利	《臺灣通 史》卷29
陳夢煒	—	福建同安	陳永華長 子	—	工官	奉遣齎降表納 款於清	《臺灣外 誌》卷29
陳繩武	—	福建同安	陳永華姪	—	兵部贊畫	永曆18年渡 臺，知兵事	《閩海紀 要》卷下

渡海東來忽幾秋：明清之際渡臺文士的見聞與際遇

黃堂壯	—	福建晉江	天啟2年薦辟生員	—	隆武初年特進戶部侍郎	入海與鄭成功相略軍機，其次女棄娘配傅為霖次子傅璇	《安海志》卷23；康熙《臺灣府志》卷8
馮錫范	—	福建晉江	工官馮澄世次子	—	侍衛	永曆18年渡臺，備受鄭經、鄭克塽父子信任	《閩海紀要》卷上、下
馮錫圭	—	福建晉江	工官馮澄世之子	—	督理徵糧、兵官	奉遣齎降表納款於清	《臺灣外誌》卷29
傅為霖 (?-1682)	字石漪，號晦三	福建南安	會元傅夏器後代	能文，工詩，所著有《賜谷詩集》、《文集》、《別集》	賓客司行人	因鄭經西征後而入臺，以密書通清總督姚啟聖，事發，全家盡殲	《泉州府志選錄》；《憂畏軒奏疏》
辜朝薦 (1599-1668)	字端敬，號在公	廣東揭陽	崇禎1年進士	著《疏草》、《桑浦行吟》	參與軍國大事	永曆18年隨鄭經渡臺，尋卒	《廣東歷史人物辭典》
楊英 (?-1680)	—	福建	—	著《從征實錄》，久歷藩幕，周習典禮	戶官	永曆15年隨鄭成功渡臺，上務農策，管糧務。又曾從鄭經渡海西征，並奉使赴日追討存銀	《從征實錄》
楊秉模	—	福建同安(金門)	兵部車駕司主事楊期演姪子	篆〈明驍騎將軍雪堂楊公暨孝慈桐夫人壙志〉	澎湖安撫司	永曆37年4月具啟有鱸魚登澎湖島、百姓驚異	《廈門墓誌銘匯粹》；《閩海紀要》卷下
楊明琅 (1612-1675)	字質人	福建晉江	崇禎16年進士	撰〈敘英雄譜〉	—	永曆29年被鄭經執入臺，尋卒	《海紀輯要》卷2
廖康方	—	福建龍溪	吏員	—	總制坐營中軍	清初歷任天長縣巡檢、餘姚縣典史，永曆28年因耿王變亂後而入臺	《憂畏軒奏疏》
葉亭	—	福建龍溪	—	學識優長、才具練達。為國子監助教，教之養之，使臺人知學	萬年知縣、國子監助教、禮官、漳州知府	永曆15年從征至臺	《臺灣外誌》卷13；《臺南市志》卷7
葉后詔	字伯俞	福建同安(廈門)	諸生，崇禎17年應歲貢	善於訓迪諸生，著《鶴草》、《五經講義》	國子司業	永曆18年至臺	《閩海紀要》卷上；《明遺民錄彙輯》
蔡政 (?-1668)	字拱樞	福建同安(金門)	—	性至孝，謹敏多才略	賞勳司、禮官	永曆15年從征至臺；奉令巡訪封內	《閩海紀要》卷上

臺灣文獻

65卷第2期

蔡鳴雷	—	福建晉江	生員	—	掌稿參軍	永曆15年以首 程文員從征至 臺，17年降清	《鄭氏關係 文書》
諸葛倬 (1605-1683)	字士年	福建晉江	隆武恩貢	著《諸葛士年詩集》20卷	光祿寺卿	永曆34年入臺，尋卒	《臺灣通史》卷29； 《廈門志》卷13
諸葛晃	字元階， 號朗園	福建晉江	諸生，諸 葛倬之子	撰〈臺灣答友人 書〉、著《詩集》	—	隨其父入臺	《豐州集 稿》卷1、5
諸葛璐	字元策	福建晉江	諸葛倬之 子	著《淮上集》	—	隨其父入臺	《臺灣詩 乘》；《南 疆逸史》卷 18
鄭成功 (1624-1662)	名森，字 明儼，號 大木	福建南安	弟子員	讀書穎敏，不治章 句，部分詩作收入 《延平二王遺集》	延平王佩招 討大將軍印	永曆15年4月 首征至臺，以 赤嵌為安平 鎮，總號臺地 曰東都，設一 府二縣，撫輯 番社、屯田墾 荒、整編軍隊	《鄭成 功 傳》
鄭 經 (1642-1681)	字式天， 號 賢 之 (元之)	福建南安	鄭成功長 子(延平 世子)	工詩賦，善弓馬， 著《東壁樓集》	延平王佩招 討大將軍印	永曆16年10月 渡臺，改東都 為東寧，仍奉 永曆正朔。28 年乘三藩之亂 率師西征。34 年師老返臺	《鄭經鄭克 塽紀事》
鄭 灞	—	福建南安	鄭成功從 弟	—	禮官	永曆16年渡 臺，歷鄭氏三 世，參與重要 大事	《閩海紀 要》卷下
鄭平英	字明持， 號衡千	福建南安	鄭芝鵬四 子	—	刑官	約永曆18年入 臺，奉齋表至 施琅軍前降	《靖海紀 事》卷下
鄭省英	字明志， 號修千	福建南安	鄭芝堯長 子	仁聲仁聞，遐邇咸 知	承天府尹、 思明州知 州、宣慰使	永曆15年從征 入臺，12月授 承天府尹，鄭 經嗣位任職如 故	《延平二王 遺集》
鄭得瀟 (德瀟)	字慕生， 號蓬蓽	福建同安 (廈門)	諸生	鄉試不遇，遂棄 去；沉酣經史。 博洽群書，方正澹 雅，著《五經通 義》、《易研》、 《文學指南》、 《史統》	中書科，供 筆札	永曆34年東 渡，被推為文 辭巨手，代修 進降表	《臺南市 志》卷7； 《閩海紀 要》卷下

渡海東來忽幾秋：明清之際渡臺文士的見聞與際遇

盧若騰 (1598-1664)	字閑之，號牧舟	福建同安 (金門)	崇禎13年進士	著《留庵文集》、《方輿互考》、《耕堂隨筆》、《島噫詩》	兵部尚書	永曆18年春3月往臺，至澎湖，尋卒	《島噫詩校釋》
顧 祔	字南金	浙江太平	弟子員	在福建浦城曾題〈栝浦歲暮聞風有慨〉、〈浦城待援追憶建城事志慨〉二詩	承天府府尹	永曆15年底頃入臺，與沈光文相友善，並參與過鄭清和談事	〈明鄭東都承天府尹顧祐生平事略考〉；《新修浦城縣志》卷38
顧敷公	—	浙江太平	承天府知府顧祐之子	居臺久，習知山海夷險	在臺任官	隨其父入臺	《裨海紀游》
謝 維 (1618-1682)	字繩騰，號摩詰	福建永春	增廣生	聰敏過人，讀書成誦，即終身不忘。長於史學，素懷班定遠之風	工官	隨鄭成功渡臺，平定南社事件，鄭成功凡事資以定畫	《閩臺關係族譜資料選編》
謝揆英 (1644-1722)	字韜，號端百	福建永春	工官謝維之次子	少有志操，熟《綱鑒》、《左氏傳》	武職	鄭經以勇敢有材，命管武職，領一軍，論功行賞，仍以文銜食二千石，俸不與恒同	《閩臺關係族譜資料選編》
羅 紘 (?-1664)	字子木	南直隸鎮江(或溧陽)	—	著《羅子木詩集》，授徒蘇州。性尚義，年少有奇氣	參軍	滇事急，張煌言派遣入臺，責鄭成功出師援救，旋返	《魯之春秋》卷14
慕天顏 (1624-1696)	字鶴鳴，又字拱極	甘肅靜寧	順治12年進士	著《慕中丞疏稿》	清興化知府加卿銜(太常寺卿)	康熙8年與都督僉事季佺等代表清廷抵臺進行協商談判	《閩海紀要》卷上

參考書目

一、專書、史料彙編

- [明]王忠孝著，夏斯點校，《惠安王忠孝公全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12月。
- [明]朱舜水著，朱謙之整理，《朱舜水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9月。
- [明]池顯方撰，廈門市圖書館校注，《晃巖集》。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9年9月。
- [明]沈有容，《閩海贈言》，臺灣文獻叢刊第56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年。
- [明]姚旅著，劉彥捷點校，《露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
- [明]徐孚遠撰，姚光輯，《釣璜堂存稿》，清代詩文集彙編1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據民國15年金山姚氏懷舊樓刻本影印。
- [明]張煌言，《張蒼水先生全集》。寧波：寧波出版社，2002年7月。
- [明]張燮，《東西洋考》。京都：中文出版社，1969年1月。
- [明]黃宗羲，《賜姓始末》，臺灣文獻叢刊第25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年。
- [明]楊英撰，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從征實錄》。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5年8月。
- [明]潛苑主人（鄭經），《東壁樓集》。東京，高橋情報，1990年據日本內閣文庫收明甲寅（1674）年序刊本影印。
- [明]蔡獻臣，《清白堂稿》。金門：金門縣政府，1999年11月。
- [明]盧若騰著，吳島校釋，《島噫詩校釋》。臺北：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3月。

- 〔清〕不著編人，《延平二王遺集》，玄覽堂叢書·續集第26冊。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85年12月。
- 〔清〕江日昇撰，劉文泰等點校，《臺灣外誌》。濟南：齊魯書社，2004年5月。
- 〔清〕李聿求撰，凌毅標點，《魯之春秋》，明末清初史料選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年8月。
- 〔清〕阮旻錫著，廈門鄭成功紀念館校，《海上見聞錄定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2月。
- 〔清〕阮旻錫撰，何丙仲校注，《夕陽寮詩稿》。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1年4月。
- 〔清〕季麒光撰，李祖基點校，《蓉洲詩文稿選輯·東寧政事集》。香港：香港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
- 〔清〕施琅撰，王鐸全校注，《靖海紀事》。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
- 〔清〕夏琳，《海紀輯要》，臺灣文獻叢刊第22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年6月。
- 〔清〕高拱乾纂輯，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65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年。
- 〔清〕查繼佐撰，《東山國語》，臺灣文獻叢刊第163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年。
- 〔清〕查繼佐撰，方福仁點校，《罪惟錄》。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
- 〔清〕陳國仕輯錄，《豐州集稿》。南安：南安縣志編纂委員會，1992年10月。
- 〔清〕陳夢舟修，〔清〕張奎華纂，《雲夢縣志》，清代孤本方志選第2輯·湖北22。北京：線裝書局，2001年據清康熙7年刻本影印。
- 〔清〕陳夢雷，《松鶴山房詩集》，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415冊。上海：

-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據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銅活字印本影印。
- 〔清〕溫睿臨撰，《南疆逸史》，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33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據北京圖書館藏清傅氏長恩閣抄本影印。
- 〔清〕萬友正修，〔清〕黃家鼎輯，《泉州府馬巷廳志》，中國方志叢書華南地方福建省第98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據清乾隆41年修、光緒19年重校補刊本影印。
- 〔清〕慕天顏，《慕中丞疏稿》。清康熙25年刻本，上海圖書館藏。
- 〔清〕蔣毓英撰，《臺灣府誌》，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71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據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影印。
- 毛一波，《南明史談》。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年11月第2版。
- 王成勉，《氣節與變節：明末清初士人的處境與抉擇》。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3月。
- 王汎森，《晚明清初思想十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12月。
- 何冠彪，《生與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擇》。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民國1997年10月。
- 何炳仲、吳鶴立編纂，《廈門墓誌銘匯粹》。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1年6月。
- 何培夫主編，《金門馬祖地區現存碑碣圖誌》。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99年6月。
- 吳一煥，《海路·移民·遺民社會——以明清之際中朝交往為中心》。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9月。
- 南炳文，《明清史考錄》。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9月。
- 徐曉望，《早期臺灣海峽史研究》。福州：海風出版社，2006年5月。
- 張炎，《鄭經鄭克塽紀事》，臺灣研究叢刊第86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1966年6月。
- 莊為璣、王連茂編，《閩臺關係族譜資料選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8月。

連雅堂（橫），《臺灣通史》。臺北：黎明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5年1月。

黃典權，《蔣鳳墓誌銘研究》。臺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68年。

黃典權，《鄭成功史事研究》。臺南：臺南社會教育館，1971年10月。

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明清臺灣檔案彙編》。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4年3月。

諸家，《徐閻公先生年譜》，臺灣文獻叢刊第123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年10月。

郭秋顯選注，《徐孚遠·王忠孝集》，臺灣古典作家精選集2。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2年12月。

潘承玉，《南明文學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12月。

鄧孔昭，《鄭成功與明鄭在臺灣》。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3年4月。

謝正光、范金民編，《明遺民錄彙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7月。

謝國楨，《增訂晚明史籍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2月。

龔顯宗編著，《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資料增補》。臺南：臺南市政府文化局，2012年11月。

二、期刊論文

石萬壽，〈沈光文事蹟新探〉，《臺灣風物》，43卷2期（1993年6月），頁15－36。

朱鴻林，〈鄭經的詩集和詩歌〉，《明史研究》，第4輯（合肥：黃山書社，1994年12月），頁212－230。

林偉盛，〈國姓爺攻臺之役的再思考〉，《臺灣文獻》，55卷4期（2004年12月），頁1－32。

周婉窈，〈山在瑤波碧浪中——總論明人的臺灣認識〉，《臺大歷史學報》，40期（2007年12月），頁93－148。

唐立宗，〈明鄭東都承天府尹顧祩生平事略考〉，《臺灣文獻》，56卷4期（2005年12月），頁1－22。

- 孫清玲，〈鄭氏政權時期臺灣的政治移民〉，《福建師範大學學報》，4期（1999年12月），頁131 - 135。
- 徐一智，〈明遺民的抉擇與處境－以王忠孝、李茂春、沈光文為例〉，中壢：「『明清變動社會的探討』青年學者論文發表會」，2005年5月28日。
- 浦廉一著，賴永祥譯，〈延平王戶官鄭泰長崎存銀之研究〉，《臺灣風物》，11卷3期（1961年3月），頁25 - 150。
- 翁佳音，〈17世紀後半的漳州海商與通事〉，《歷史臺灣：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刊》，6期（2013年10月），頁7 - 24。
- 張萍，〈從《蓉洲詩文稿》探究沈光文生平事蹟〉，《寧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5卷6期（2012年11月），頁51 - 55。
- 陳小冲，〈張燮《霏雲居續集》涉臺史料鉤沈〉，《臺灣研究集刊》，91期（2006年），頁74 - 80。
- 黃典權，〈夢蝶園主李茂春〉，《臺南文化》，2卷1期（1952年1月），頁127 - 131。
- 樂承耀，〈材料、事實與反思：有關沈光文的“一樁文化史公案”——兼與潘承玉先生商榷〉，《中共寧波市委黨校學報》，34卷5期（2012年9月），頁100 - 108。
- 潘承玉，〈真相、遮蔽與反思——關於一樁文化史公案的後續考察〉，《紹興文理學院學報》，27卷3期（2007年9月），頁93 - 100。
- 潘承玉，〈神話的消解：詩史互證澄清一樁文化史公案〉，《復旦學報》，2期（2008年6月），頁131 - 139。
- 蔡靖文，〈由《釣璜堂存稿》試探徐孚遠入臺之相關問題〉，《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新68期（2007年5月），頁50 - 67。
- 龔顯宗，〈從《東壁樓集》看鄭經與臺灣〉，《歷史月刊》，173期（2002年6月），頁49 - 54。

Ming-loyalist Literati in Taiwan during the Ming–Qing Transition
Period

Li-chung Tang^{*}

Abstract

During the Ming–Qing transition, the Ming–loyalist literati who followed Zheng Chenggong (1624–1662) and Zheng Jing (1642–1681) to Taiwan either were from the Zhangzhou and Quanzhou areas of Fujian or had special ties with the Zheng family. The migration of Ming–loyalist literati to Taiwan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phases. The first phase was before the arrival of Zheng Chenggong. In the second phase, some literati joined Zheng Chenggong’s troops to enter Taiwan in 1661. The third phase was characterized by literati who emigrated to Taiwan with Zheng Jing’s forces between 1662 and 1664. In the fourth phase, more literati came to Taiwan after Zheng Jing’s expedition of 1674 against the Qing. With a few exceptions, most Ming–loyalist literati in Taiwan used aging as an excuse to retire from politics. These literati’s political passivity was partly due to various disagreements with the Zheng regime. As homesickness and distress increased among both the literati and the ruling elite of the Zheng regime, the prevailing depressive sentiment undermined the strength of the state.

Keywords: Ming–Zheng dynasty, Zheng Chenggong, Zheng Jing, Ming loyalists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臺灣文獻

65卷第2期

19世紀中葉臺灣的米穀貿易：以進出口數據 為中心的探討

黃順進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